

安源

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
閻小駿 譯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4

© 2012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988-8208-06-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譯序	vii
致讀者	xi
致謝	xv
緒論	1
1. 革命預演	15
2. 教導革命：1922年罷工	41
3. 中國的小莫斯科	69
4.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109
5. 築造革命傳統	135
6.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淨化革命傳統	181
7.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217
結論	249
註釋	263

緒論

革命傳統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這一概念本身即是內在矛盾的。革命旨在顛覆傳統，而非神化及崇拜傳統。然而，經革命之火鍛煉而生的民族國家往往仍營造出關於自身歷史淵源與政治遺產的種種神話。這些神話一方面影響力強大且持久，但另一方面也同樣矛盾難辨、倍受爭議。正如圍繞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不絕於耳的爭論聲音所表明的那樣，後人對於重要如斯的歷史事件背後所蘊涵的複雜意義在數百年後依然各執一詞。¹ 更晚近而言，美國的茶黨運動 (Tea Party Movement) 得名於作為獨立革命導火線的重要事件——波士頓傾茶事件，但其凸顯的是民眾在解讀美國革命遺產上所存在的深刻分歧。² 儘管爭論的各方都自稱是國家革命歷史傳統的忠誠守護者，事實上他們卻不外是因當下的議題而起舞。對於革命傳統各自不同的主張和解讀，不僅改變了有關過去事件的陳述，也塑造着現在和未來的政治軌跡。

直面過往的革命歷程、描繪未來的政治圖景——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完成這一挑戰性任務都不會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問題重重，更難以逆料。鋪展中國艱難曲折的革命歷程不僅對中國，亦對整個世界有着巨大的影響與後果。然而，這一過程的未來方向卻不甚清晰：因為事實上並無明確先例或相似事例能輔助我們自信地預測中國共產主義體系的未來命運。從前，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彷彿是出自於共同的革命源頭，並且似乎沿着相似的歷史道路發展演進。而如今，他們發展道路的對比卻再強烈不過。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指出：

如果說二十世紀被俄國革命的軌跡所主導甚於其他任何一個事件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將會被中國革命的結果所塑型。蘇維埃政權……在七十年之後轟然解體，猶如它創立時一樣迅速……中國

革命的結果卻有着驚人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走進第七個十年之際已然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二十五年來一直保持着最快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擁有着數量最多的人口紀錄……從這一成就的特點和規模來說（當然不止一項）——痛苦而諷刺。然而對比中國和俄國革命的命運，其間的區別則毋庸置疑。³

安德森作出此番評論的時候，一方面蘇聯的垮台（二十多年之前）使得俄國革命成為記憶中遙遠的過去；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一直堅持紀念其革命傳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展現了驚人的力量，使得中國革命的經驗和傳統再次得到新的關注。

革命的最高領導者毛澤東已於幾十年前辭世，但他的畫像仍然懸掛在象徵中國政治最高點的北京城中心位置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思想」以革命鬥爭為這位領導人言論的主要觀點，仍然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毛的陵墓——位於天安門廣場城樓的對面——仍然持續吸引着大批觀光者去瞻仰其經過防腐保存的遺體。然而毛澤東的領袖魅力卻不止於京城內，遠在 900 英里外的重慶，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不久前又掀起了一股「唱紅歌」的群眾運動，使毛澤東主義的革命文化重獲新生。⁴ 確切地說，對毛澤東及其革命思想的崇拜在中國人中遠非普遍現象。⁵ 雖則如此，對毛澤東的崇敬還是大大超出了由國家支持的各種活動。一項在中國四十個主要城市展開的民眾宗教信仰調查顯示，近 12% 的城市居民在家中掛毛主席像——這與在家供奉祖先牌位的數量相近，高過在家敬拜佛像的比例（10%），以及供奉財神的比例（9%）。⁶ 農村地區對毛澤東革命成就的尊崇就更為直露公開。⁷

毛澤東的激進政策對於現今的中國政治有何確切影響還在爭議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所領導的革命建立起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家，並且這個國家現在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這場革命的重要性無可辯駁。⁸ 中國共產黨能夠開闢特殊道路的原因到底是甚麼？中國的革命模式是怎樣變得與俄國的樣板原型如此差異巨大，其原因在於何處？革命傳統對於今天的中國人又意味着甚麼呢？

毛澤東與共產主義革命

西方學者或記者們近期的著作對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特殊革命性變革，有意刻畫出一種不良的形象。⁹ 最暢銷的一本毛澤東傳記告訴我們，從作為一個政治組織者的早期歲月開始，毛便是一個暴虐和冷酷無情的人，而他的偏激主張與圖謀將會給大多數國人帶來不必要的苦難。¹⁰ 雖然共產主義革命是以中國社會中最貧窮且最弱勢的人民的名義發動的，這個群體卻將因毛澤東的荒唐行為而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痛苦與折磨。

這一殘酷的論斷有大量證據支持。¹¹ 然而，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毛澤東在尚未掌握強制工具以驅使人民聽命於他之時，是怎樣以傑出的能力使得數以百萬計的國人信服於他，並願為他的革命運動而犧牲呢？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普通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在他逝世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對毛主席和他的事跡存有懷念之情呢？毛澤東的領袖魅力，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是廣義上的革命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天，這革命傳統仍在以一種突出、甚至時而令人訝異的方式持續，反覆迴響。

與列寧領導的革命不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¹² 繼1911年創建共和的辛亥革命和1925–1927年國民黨發起的國民革命，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黨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經歷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才最終獲得政治上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最初向俄國學習，以城市的無產階級為對象開展運動，但後來被迫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在毛澤東帶領下，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並成功抵抗日本人的侵略（1937–1945）和國民黨的進攻（1946–1949）。解放戰爭的軍事勝利並未終結革命的進程。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落實到行動上即成為從五十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和婚姻法，推廣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1966–1976）一系列動盪不寧的群眾運動。毛澤東畢生致力於開創和培育一個全新的革命文化。雖然這工程直至1976年他逝世時仍未完成，然而其影響卻並非無足輕重。

中國革命歷程的起落變遷，為社會科學解釋和大眾文化解讀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革命所採取的政策不同，革命活動中心的地理位置相異，取得成功的程度也有別，中國革命因此為各

種不同的爭議學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某些理論認為，與蘇聯的聯繫對革命勝利起着決定性的作用，¹³ 而另一些理論則認為，毛澤東獨特的群眾動員模式尤為關鍵。¹⁴ 二者各自都提出了一系列因素（如民族主義、階級鬥爭、列寧主義的黨組織形式、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等等）來解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緣何取得最終勝利及革命傳統緣何得以長期保持。¹⁵

創造革命傳統：文化置位

本書無意否定任何上述這些因素在綜合解讀中國革命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上的模仿和創新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執掌政權及執政之後進行統治的關鍵要素。然而，這仍未能解答一個問題，即在當時和如今，革命者如何將激進的新觀念引入，及採用甚麼方式得到聽眾對象的回應？共產黨員又是如何讓普通中國老百姓理解、接受，甚至在某些時候擁護革命權威的呢？

大多數共產黨的早期領導者，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是受過教育的讀書人。他們在進行組織工作活動中，運用了重要的文化資本和創新力。我認為，動員過程的核心就是文化置位 (cultural positioning) ——或者說，對一系列符號資源（如宗教、儀式、修辭、服飾、戲劇、藝術等等）的戰略性運用在政治說服中所發揮的作用。毛澤東和他身兼啓蒙者與革命者於一身的戰友們，採取了靈活的手段，不僅將蘇聯的理念和制度移植到中國土壤，更進一步使得中國革命的個體發展將與蘇維埃的原型模板迥然相異。

強調文化置位在孕育特殊的中國式共產主義這一過程所起的重要作用，並非暗示某種從帝制時代到如今的重要延續性可以預先確定某種特定或可預測的結果必然發生。在本書之初即需聲明，本研究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既無假定中國的國民性格或民族精神一成不變，亦無假定其擁有一個內在一致的符號和意義體系。而是，為了和最新的社會科學領域形成的理論保持一致，這裡所指的文化被認為是由靈活變化的、時時矛盾的符號學實踐活動所組成的集合。¹⁶ 然而這並非指文化會隨便任意或無限變形。這樣的假定會剝奪文化因素所具有的任何獨立解釋力。同理，文化置位在任何社會運動中都有某種程度上的顯現，雖然並不總是有效。為了有信服力，文化置位要求操作者對普遍通行的規範和習慣高度熟悉，並且時刻注意在

傳統架構中進行有意義的創造的各種可能性。社會抗議（及領導抗議者）在應付這一挑戰上取得成功的程度並不相同。

儘管社會科學中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已經進行了不止一代，它通常都是以話語分析的形式進行，分析對象包括著作、演講、電影、節慶和其他通訊材料。這些材料被當作是脫離實體的文本，其中的意義完全可通過學者的解構而顯現。而本研究中所採用的分析方式則有所不同。文化置位需要操作者積極主動的行動——而這些行為只有通過認真關注那些具體從事者才能得以理解。製造新的承諾和身份認同成功與否，自然取決於信息傳播者的技巧，但這信息本身的內容和表述結構也同等重要。

因此，本書也是一項有關政治領袖的研究。文化置位當然不是革命領導工作僅有的層面，但卻是極為重要的層面。¹⁷ 毛澤東和他的黨內同志在招募和動員群眾追隨者的努力中，充分意識到了符號性資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和適應力。儘管深受蘇聯宣傳鼓動模式的影響，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敏感。誠然，不同的中國革命領導者在這類活動上各具風格，其成功程度也不盡相同。然而這些差異隨時間的流逝只會愈加顯著。

當然，在群眾動員中應用文化資產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者們一直以來強調此歷史大事件中的文化層面。¹⁸ 文化置位並不僅僅出現在革命運動中，任何持久的抗爭都需要將熟悉的文化資源轉化，以適應新的集體行動目標。社會學家阿爾貝托·麥路西 (Alberto Melucci) 在很多年前便指出，二十世紀歐美「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 (比如和平運動、環境運動和女權運動等等) 得以發展的中心要素即為在文化上構建全新的群體身份認同，以贏得愈來愈多的成員支持並獻身其中。¹⁹ 儘管有這些跨國的共同性，對文化力量的推崇千百年來在中國一直是施行政治權威的一大特色，故而在中國情境裡探尋這一脈絡前景尤為廣闊。²⁰ 更重要的是，鑒於中國抗爭文化中儀式和公共表演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在中國，延續性和非延續性比在其他政治情境中更易於觀察。²¹

探究熟悉的和外來的符號資源如何被應用及被融入到激進的新內容和涵義之中，提供了觀察中國革命歷程的重要視野。同時它表明了中國文化本身在這一動態的過程中是如何被轉化的。政治學家理查德·克勞斯 (Richard Kraus) 在研究中國書法在現代中國政治之作用的著作《毛筆的力量》(*Brushes with Power*) 中指出，「書法之所以在中華帝國作為首要的藝術

形式長期佔據統治地位，可以由其對於官僚統治階級所具的社會功能得到解釋。但是近期書法的地位一定要通過它在本世紀的社會革命中被賦予的新意義來解讀。」²² 克勞斯深入探索了書法這一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在政治過程中用途之變遷，而本研究亦觸及到（儘管不如其深入）廣義的文化媒體範圍：繪畫、詩歌、戲劇、舞蹈、電影、文學、音樂，等等。不過，與克勞斯的國家視角不同，本研究的關注焦點是完全的地方化視角。

安源之案例

本書旨在追溯中國革命傳統的進程，並將其與一個歷史驚人豐厚、影響深遠的小城超過一個世紀的歷程聯繫起來。這種思考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跨度之長，有別於其他研究中國革命文化的成果。²³ 作為一個以單一地點為對象並且跨越了 1949 年分界線的歷時性研究，所應用的方法與現存的極少數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微觀史學有某些相似性，最著名的如韓丁 (William Hinton) 研究山西省長弓村（譯者註：William Hinton 寫的是山西省張莊，他在書中將該村取名為 Long Bow Village）的兩卷著作，揚·米爾達 (Jan Myrdal) 兩卷陝西省北部柳林村 (Liulin Village) 研究，以及傅禮門 (Edward Friedman)、畢克偉 (Paul Pickowicz) 和馬克·賽爾登 (Mark Selden) 合著的兩卷河北五公村 (Wugong Village) 研究。²⁴ 然而，本案例研究與以上著作在很多方面又有所不同。

本研究所圍繞的重心安源煤礦並不是乾旱的華北平原上的一個農業村莊，而是位於中國中南部群山中的一個工業區。得益於其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和經濟上的特殊重要性，安源比其他大部分中國地區更早經歷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其過程也更為深入。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在安源進行了較長時期的先驅式實驗，從中總結的經驗以後在中國被廣泛推行。並且，由於安源不僅是勞工運動 (1921–1925) 的搖籃，也是組成農民協會 (1926–1927) 的基石，亦是招募工農紅軍 (1928–1930) 的一大陣地，安源經驗在此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發展的重心從工人轉向農民和士兵，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安源並非一個「典型」的中國產業工廠或集鎮——如果這樣的典型在中國存在過的話。儘管如此，了解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所發生的林林總總及其後的變遷，便可把握中國革命之基本走向的很大一部分。

研究安源，可以有助於洞察中國革命者從其發展最早期開始的行動方式和吸引力所在。安源此地的反抗歷史之長也為了解共產主義者和他們之前的起義反抗者的區別之處開啓了一扇窗。早於毛澤東開始對安源煤礦初步調查的十多年之前，安源就已被 1906 年的萍瀏醴武裝起義波及，這個起義是後來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先聲。因此此地對於比較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也是極具意義。雖然具備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兩種革命中都是領導者，但是只有在後一個革命中，他們才成功地消弭了與他們試圖團結的農民和工人之間將不同階級分隔開來的文化鴻溝。

1921 年夏，中國共產黨建黨數月之後，毛澤東第一次去安源考察，這是共產黨為開展無產階級革命、以有革命發展前景的工廠為對象所制定的一項工作。²⁵ 在毛澤東訪問之後，一批黨內同志於安源開展了一系列「紅色教育」活動，帶動了一大批活躍的工人積極分子大力參與改變窮人悲慘狀況的行動中去。幾年後，當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從組織勞工轉向建立農民協會和發展軍隊之際，安源工人也成為關鍵的人員來源，發揮了重要的帶頭作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湖南和江西兩省的農民協會因毛澤東具有影響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而倍受注意——這些協會實際上大部分是由前安源工人組建並領導的。1927 年 9 月的秋收起義以安源作為策劃和發動地點，數百名礦工參加，也堅定了毛澤東走農民革命道路的決心。至 1930 年秋天止，數千名安源工人加入了工農紅軍的隊伍。考慮到與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緊密聯繫，安源的突出優勢，在於它為考察中國革命之起源和發展所提供的啟示性作用。

安源發動群眾之所以成功，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幹部將文化資本轉化為承載具體功用的革命實踐這一行為密切相關。工人們在工人學校裡受到的正式教育，對於形成一種新的無產階級精神起到關鍵作用，但是創新性地運用經典用語、民俗、服飾、儀式及其他精英和大眾的文化資源，亦同等重要。而且以多種多樣文化為媒介展現的安源的符號性力量與日俱增。

中國共產黨早期最重要的領導人當中有三位——毛澤東、劉少奇和李立三——均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活躍於安源。三人都是生長於附近湖南鄉鎮的讀書人，渴望利用自己高等的社會地位所帶來的文化優勢，去實踐激進的社會和政治變革。²⁶ 在安源，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知識分子」同志們利用中華帝國自古以來儒家知識精英所享的教育權威性，化作新的革命用

途。²⁷ 同時，他們也認識到當地秘密會社和習武傳統的作用——如果能加以駕馭和掌控，便可促進革命事業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從大量的文化資源以及武力資源入手，將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義加以發揮運用。毛澤東等人為吸引和發展礦工和鐵路工人，文與武的形式雙管齊下，進而推動革命。文武兼用，部分因這是中國男性追求兼備的理想目標。²⁸ 另外，亦說明文化權威和政治權威如並生的支柱，其一源於文藝，另一源於武藝，廣泛地被中國人所認同。在中國情境下的政治合法性，需要這兩種力量的精巧配合運用，即所謂「文武雙全」。

共產主義勞工運動在安源取得的顯著成就，表明他們將傳統的權威來源轉而為新的政治目的服務是如此之獨具匠心。在這些可資利用的慣常資源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和類宗教式儀式。這些儀式主要衍生自民間的節慶活動、祖先神明崇拜，以及秘密會社等，為革命者折衷但有效地加以運用。類似活動，自古以來一直反映並強化中華帝國的文官行政和軍事管理架構。如芮馬丁 (Emily Martin Ahern) 所認為，中國的民間宗教以「怪誕的社會學準確性」(uncanny sociological accuracy) 映射出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系統，引導普通老百姓去理解、接近或反抗政治權力。²⁹ 雖然幾乎不具推翻現存政治秩序的指向性，但儀式活動仍是帶有革命雄心的活動組織者可資利用的有價值工具。

毛澤東生長於湖南，將臨近的安源作為革命動員地點。這決定不僅僅只是緣於地理之便。由於安源素以革命聞名，產業工人數量集中，安源煤礦成為了極好的無產階級鬥爭的開拓點。同時，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當中最投入和最有決心的幾位並無文化隔閡的問題——他們均對當地習俗極為熟悉，能夠與大部分礦工用方言通暢地交流各種行話，這大為便利他們開展活動。因為這種局內人的優勢，1922年9月，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共同在安源發起了非暴力的罷工行動並取得矚目成功，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里程碑。

這幾位湖南籍的革命者利用文化共識，以尋求基本人格尊嚴的口號發動了群眾運動。遵照毛澤東的指導意見，李立三創制了1922年安源罷工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構思巧妙地體現了主旨內容。以尋求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呼籲為框架，一萬三千名礦工和鐵路工人持續五天的罷工，贏得了所有安源職員工友和當地主要社會精英人士的關注。罷工

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在無任何財產損失或人員受傷的情況下，工人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得以顯著改善，共產黨控制下的工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也得到官方的承認，並給予很大的經濟支持。

罷工勝利之後的三年，安源成為共產主義組織活動的全國性中心。這個煤礦小鎮以「中國的小莫斯科」而著稱，並作為革命活動初期的樣板得到了全中國（甚至海外）的關注。安源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支部所在地（幾乎全由產業工人組成），擁有最大和最活躍的產業工會、第一個由共產黨資助的消費合作社、由共產黨運作的最大的工農補習學校網及第一個共產黨幹部學校。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猶如一塊磁石，深深吸引了進步知識分子和運動組織者。安源的工人俱樂部擁有超過一萬名成員，並且（根據罷工協議條款）享受到路礦公司的巨款補助，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奠定了基礎。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開展了許多項目，將民間宗教以及大眾和精英的諸多活動元素加以創造性應用，便於靈活地培養新的階級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教育、寓教於樂的戲劇表演和其他共產黨資助的活動，許多工人對中國無產階級的經濟重要性和政治潛力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結果，原先忠於當地秘密會社（即衍生自三合會的哥老會或洪幫，為當地富於反抗精神名聲的來源所在）的礦工們轉而認同工人俱樂部。這期間由共產黨緊密指導發展起來的學校活動、文化和職業培訓課程、閱覽室、圖書館、消費合作社、工會、劇社、演講社、農民協會和其他草根組織得到工人們愈來愈多的參與，充分反映了當時集體身份認同的轉變。當然，這樣的轉換並不徹底。礦工們有時表現出對領導人魅力的忠誠，高於社會主義理想。同時，工人俱樂部中那些秘密會社的武功高手們的暴力傾向，並沒有隨年輕的共產主義教育者的教育工作完全柔化。儘管如此，整個「小莫斯科」主要還是注重「文」的文化和教育甚於「武」的武力和戰爭。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可觀的大部分資金，都投入在文化課程或其他形式的無產階級教育和宣傳上。為這些教育目的而編製的課本、戲劇、歌曲、講座或其他宣傳材料，形成了一種文化範本模式。而此模式之後散播到江西蘇維埃，並且於戰爭時期在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廣泛採用。甚而，在革命運動的重心從無產階級動員轉向農民武裝鬥爭之時，³⁰ 在安源經過

教育培訓的工人擔當了重要的領導角色，如農民協會的領袖或是紅軍政委。

「中國的小莫斯科」名不虛傳。安源，這個人口不足八萬的煤礦小鎮，在其全盛時期，聚集了佔全國五分之一之多的中共黨員。儘管這一切在1925年9月被數量眾多的反對派軍隊所鎮壓而消滅，但安源試驗仍然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上佔據特殊的重要性。安源是中國最具影響的三位革命先驅的訓練場，是差不多五千名出身工人的紅軍戰士的來源地，是多個工農草根組織的建設基礎。安源及發生於其間的這些歷史事件與此後共產主義革命的走向緊密相聯。故而，毫不奇怪的是，未來幾代人都會因主張自己對安源革命遺產的所有權而爭鬥。

發掘革命傳統：文化操控

「光榮的安源革命傳統」，為人所熟知；但對後輩而言，其指引和鼓舞作用並非是無懈可擊的。儘管它對之後政策形成的影響作用得到公認，但是這段歷史以及對此歷史的評價和再現，跟隨一個個反覆變化和相互衝突的階段主題不得不一再被修改。在「發掘」(mining) 安源革命傳統的過程中，事實被有影響力的機構組織和強勢人物輕易隨便地遺忘，或經刻意編造來符合與此不一的個人圖謀或政治野心。結果革命活動及其理念的種種回憶，都相應地被擴大或刪減。

同任何複雜而漫長的歷史事件一樣，中國革命被對立的革命傳統繼承者們加以不同的解讀。³¹ 中國革命的集體記憶的建造形成，正如社會學家李靜君 (Ching Kwan Lee) 和楊國斌所強調的，「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過程。同等程度地，這也是一個記憶得以詩化的文化過程，即運用了文化的工具和資源來對記憶進行建造和表述。」³² 出於深刻的政治衝突和政治考量的驅動，對安源革命傳統的「詩化」重塑，因而牽扯入激烈的領導層鬥爭中。

在建立共產黨政權國家之後，政府的權勢部門，特別是宣傳部和文化部，率先齊心協力開始為政治大人物重寫革命歷史檔案的行動。在這重建歷史的過程中，文化置位讓位於文化操控 (cultural patronage) ——地方和中央官員將官方資源加以經營運作，因安源而獲得的資本收益亦被運用於不同目的——這些目的與當初之所以能在安源發動革命活動的那些目標大

相逕庭。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工人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文化置位使外國思想得以通過人們熟知的渠道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傳播；1949年以後，文化操控將這一運動歷史上升到檢驗政治合法性的標準試金石的高度——通過官方媒體廣泛宣傳，從而鞏固加強領袖個人的以及中國共產黨整體的政治地位。

早期的共產主義組織者果斷地利用個人權威魅力來實現他們的任務，但這些努力乃是以喚醒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群體意識為目標，而非為強化政治領袖的權力而推行個人崇拜。然則在後來的歲月中，「安源革命光榮傳統」卻被官方宣傳機構加以復活和重建，以服務於完全不同的目的。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對黨及其領導者的）忠誠奉獻取代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尊嚴成為國家的首要目的。這一過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為明顯。當時毛澤東的絕對巔峰權力，使得全國一致宣傳他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一個例證就是描繪1921年年輕的毛澤東到達安源煤礦事跡的著名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此畫1967年由一位當時尚為學生的紅衛兵藝術家完成，印在大約九億多張海報和數不清的其他形式宣傳品上，並成為神化毛澤東的重要標誌，推高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儘管毛澤東對安源工人運動的實際貢獻無法與劉少奇或李立三相比，安源工人運動勝利的全部榮譽最終還是被歸功於他一人。這個共產黨國家的全部力量，發揮在類近宗教的復興活動中，企圖從所謂的蘇維埃「修正主義」的危機中護衛這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革命大救星以及他的「正確革命路線」。兼及文治和武功，一個新的革命神學體系建造了毛主席在安源工人中尊享的精神領袖地位。雖然文化大革命嚴重過度，但安源歷史的重寫既非開始於此亦不會於此結束。

強調個別中共領導人之安源聯繫的文化操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即彰彰甚明。當時支持劉少奇副主席的不同級別官員運用視覺和文學媒體，增添他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者形象的光芒。效仿斯大林早期的個人主義崇拜，通過繪畫、戲劇、小故事、電影、博物館展覽和其他藝術表現形式，表現劉少奇在安源的英雄事跡，實現對他的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安源經歷的神化，扭轉了之前的文化操控實踐的方向，並進一步深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得到人民解放軍鐵拳支持的紅衛兵佔據舞台中心，他們對安源故事的重新解讀，亦被刻意灌輸進一種絕對武力傾向。劉

少奇由於在安源期間採用了非暴力手段而否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因而遭到攻擊；他的「修正主義」錯誤雖是四十年前的陳年舊事，卻依然成為他遭受殘酷政治迫害的主要理由。文化大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彷彿是一場充斥武力及宗教式狂熱的十字軍東征。革命傳統中的暴力衝動在其間被景仰，並越過和取代較為克制的有組織和教育性的活動——雖然這後兩者實際上亦曾在毛澤東本人的認可之下，對於安源的革命勝利經驗至關緊要。至少暫時來說，武人的方式勝出了文人的方式。在今天，爭奪安源遺產的各色對立者——既在國家層面上，亦在社會範圍內——仍然因為傳統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而爭執不休。

安源的挑戰

本書的主題是安源革命傳統之建造和發掘的過程，涉及從最初開始到如今的漫長歷史。前四章着重介紹文化置位在革命動員中的作用；後面各章則轉而解釋文化操控在評價和重新解讀這一複雜歷史遺產中的強大力量。安源的案例促使我們去探尋中國革命傳統的多重含義和多種功用——它不僅僅是群眾動員之渠道、精英權威之基石、國家教育和宣傳之核心主題，對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來說，亦具有長期持續的束縛和鼓舞雙重意義。

本書對安源革命傳統還原和重造的過程及革命最初的階段給以同等關注。我的意圖不僅在於簡單披露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曾經發生過的扭曲和欺騙，亦在於更好解釋從過去到現在的革命者所展現的奉獻和投入。在過去的那一個世紀，千百萬人曾付出巨大犧牲，加之對今天的中國人依然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革命人格和聖地，渾然構成相互交織的各種歷史事件及記憶。這些事件和記憶的連接體雖然時常因為一己私利之便而飽受威脅，但它們卻是含有深刻的文化與政治意義。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引入蘇維埃的理念，並適應國情加以改造，以使其與本土文化共鳴回應，形成一曲一張的高度彈性——這種能力在我們評價列寧主義式黨國體制政權在中國的建立和存續時，不可輕易忽視。

如果說中俄革命結果之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兩國培育一種可信的政治文化並將之正常化的成功程度，存在高下之分，那麼將安源這根絲線

從複雜的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的巨幅織錦上挑揀出來，會成為當代中國的重大挑戰之一。從一方面來說，不斷湧現的紀念（和評論）「安源光榮革命傳統」的文學和藝術作品，證明了它持久的感人力量，亦突出強調了中國政治想像中毛澤東革命追求所具有的長久魅力。另一方面來說，安源煤礦工人悲慘生活的現實狀況（如同一個世紀之前）和經過浪漫化處理的形象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提醒我們中國革命之任務尚未完成。被剝奪的底層人民對於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的要求，哀矜動人地表達在安源罷工的基本口號之中：「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這在當代中國依舊是政治討論的核心問題。³³ 而能否完成中國革命傳統中這些未盡之承諾，將最終決定中國黨國體制之存續與否。

結 論

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以否定中國文化為其普遍特徵，從破除傳統的「五四運動」時期開始，至席卷全國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主題的「破四舊」紅衛兵運動時期達到最高點，使得大家對革命文化本身缺乏嚴肅認真的研究，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最近。毛澤東及其同志們是否成功對傳統給予致命一擊，仍然是爭論不休的問題，不過，毋庸置疑的一點是，他們顯然持有如此的強烈意圖。¹

根據歷史學家李文遜 (Joseph Levenson) 影響甚廣的解釋分析，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家和活動家們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喪失殆盡。李文遜主張，恰是由於儒家傳統缺位造成思想知識和道德的真空，導致熱衷政治的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另一途徑。對比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李文遜強調，共產主義運動的俄國模式在萌芽發端時期其實更為自然而然，也更符合自身的文化。

俄國人和中國人……發動革命基於不同的出發點。俄國部分是由於歐洲的原因；中國全為中國的原因。……〔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在於擔當了儒家文明喪失掉價值之後的一個填充物，並非（如同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備魅力）因其是本國知識界所傳承之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在中國，作為消除文化困惑窘境之解決之道，馬克思主義其實如一個天外救星；而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方案彷彿如同按劇情發展邏輯而產生的。²

根據李文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儒家傳統失去優越性之後的一個人工替代品，並非是從本土的文化衝動中有機生長出來的，與俄國正是相異。上述內容撰於 1965 年中國即將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臨界時刻，李文遜這一論斷似乎意味着中國將有條不紊地摒棄落後的過去所遺留

下來的任何殘餘成分。然而，如今由於又增添了可資研究分析的歷時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比較中俄兩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道路會賦予大家迥然不同的理解。正如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對當代中國知識話語的考察所指出：「將毛澤東主義和儒家傳統當作是單一的衍變生成的混合體，幾乎成了一種陳詞濫調。」³

蘇聯已解體多年，而中國依然保持着共產主義政治體制，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似乎已不如以前那般生硬。相較於東歐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崩潰於朝夕，中國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持續存在似乎昭示，中國共產主義制度的彈性其實反映了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被認可和重新導向，而不是遭到全盤的否定和替換。儘管在中國如今已難尋覓一批（甚至一個）共產主義的「真正信徒」，但是一代又一代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用眾人熟習的框架來解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種種做法所產生的影響，仍不可輕視。這個文化詮釋的過程，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而言十分關鍵，而且對於支撐現今政治體制的民族主義及革命權威來說，亦佔據中心地位。並且，這一過程有助於解釋一個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其實均為舶來品的共產主義黨國體制，按照李文遜的用語即一個天外救星，是如何被接納以致被認為是「中國的」。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系列政府提倡的舉措加上社會的反響，使得新的秩序與文化協同，借用鄧小平形容他主導的經濟改革的語彙，即是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49年，中國共產黨決定進駐而不是搗毀作為中華帝國權力象徵中心的天安門，及後面富麗壯觀的紫禁城。這一決定表明在構建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時，舊建築充任了靈活的腳手架用途。⁴ 儘管文化大革命猛烈地攻擊「四舊」，文革也還是汲取了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傳統。⁵ 此外，那個時代的宗教狂熱賦予毛澤東及其思想神聖無比的權威，以至於如今在中國各地仍然受到一定的崇拜。這一現象被齊慕實 (Timothy Cheek) 描述為「二十世紀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源遠流長的中國民俗宗教相互混合的一種驚人表現」。⁶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一場生動形象的表演作了漂亮的自我展示，以此宣明自己傳承且守護着悠久的五千年文明。以古代篆刻藝術為靈感的奧運會徽醒目而別緻，由電影導演張藝謀編排的開幕式令人歎為觀止。中國共產黨通過精彩的北京奧運會，明確地宣示要把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發揚光大。為了在全球範圍內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由中國政府資助在世界各地建立幾百所「孔子學院」，亦是受此驅動的表現。

儘管中國今天鮮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則一點也不缺。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文化民族主義替代共產主義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⁷ 中國的革命一貫以帶着全球理想目標和意義的民族主義革命的框架來建構，無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間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的革命，還是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運動，情況都是如此。⁸ 在後毛澤東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文化民族主義重新煥發活力，表現形式則耳目一新。文化民族主義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基礎和試金石。從早期革命領袖身穿中式長衫，按儒家古文款式撰文以動員安源工人，到文革期間經過精心部署的對所謂劉少奇蘇修主義的批判，直至最近的奧運盛會和遍佈全球各地的孔子學院，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在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和存續延綿上，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強調文化動員中民族主義的重要作用，絕不意味着否認國際影響對中國革命發展路徑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共產黨及其創建的國家政權，高度仿效布爾什維克和蘇聯，正如今天孔子學院以法國文化協會和歌德學院為榜樣。然而，其中的意思絕不是指毛澤東及其後繼者只是簡單地給所謂無可避免存在的根本「傳統中國文化」披上一件共產主義外衣而已。其一，過去在文化方面的實踐，實在過於紛繁多樣並且變化多端，以致於無法得出一個單一的政治結果。另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革命同由此而誕生的共產主義黨國體制二者，確然是從外引進的**非傳統**政治形式。但是，儘管毛澤東及其同志們都堅持不懈地引入一種新型的激進政治，並培養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來作為支持，他們對於任何文教的或武力的、民間的或舶來的廣泛文化資源在實現其宏大目標方面的價值，都一概重視。

毫無疑問，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幹部在實踐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方面都可以同樣機敏和熟練。瞿秋白曾經批評早期中國共產黨員隊伍中那些曾在歐洲受過教育的人在本國卻表現得如同一個「外國人」，說明當時許多

歸國留學者在處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關係時遇到種種難題。而且，這類問題不僅源於個人局限性或能力不足。更為複雜的是，黨內官方政策在處理中國傳統時，並無一致的指導宗旨。直到瞿秋白擔任江西蘇維埃人民教育委員職務之後，中國共產黨才開始明確制定關於文化推廣並且本土化的政策。延安時期不同意見重又浮現，直到毛澤東表示推崇「民族形式」並號召終結外國的陳舊套路才（暫時）將爭議平息。⁹而這種「民族形式」本身極易受到官方批判的左右，這一點在文革期間表現得尤為鮮明突出，首先是破「四舊」運動，然後又是批林批孔運動。

共產黨的中國文化政策一直不曾連貫一致，有時甚至效率低下。最近的一個事例便是天安門廣場上位於國家博物館（前身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前僅安放了三個月的大型孔子銅像一夜之間突然被移走，事先未曾有發出通告。¹⁰這次搬遷究竟是因為終於後知後覺發現這尊雕像在眾多革命紀念碑之中顯得格格不入，還是源於新毛澤東思想在政治精英階層中再次復蘇，尚不得而知。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一矯正行動是文化操控上的一次笨拙嘗試。

即使對於久經此道的中央宣傳部而言，文化動員工作也可能出現考慮不周或是不成功的情況。不過從中國共產黨早期開始直至現在，這類工作被視為黨的任務極其關鍵的部分。共產黨組織者們一代又一代積累起來的經驗也證明，李立三在安源推行的充滿靈感的方式極其巧妙：通過文化圈內人士將家喻戶曉的修辭與傳統進行技巧性的重新配置，可以激發群眾的支持並且足以維持。成功的文化置位與文化操控方式讓舶來品儼如舊相識；按俄羅斯食譜製作的食品也會被嘗出中國風味。

中國與俄國之比較

儘管中國革命確切受到俄國範式的深刻影響，但是在對於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評價和利用這些方面，二者大相逕庭。研究蘇聯宣傳機構的歷史學家彼得·凱內茲認為，布爾什維克以居高臨下和不屑一顧的態度來對待俄羅斯文化：「列寧及其革命戰友們認為俄羅斯人的本土文化其實毫無價值。」¹¹同樣，「眾所周知，斯大林和他的陣營十分蔑視農民階層和農民信仰。」¹²與此相反，雖然毛澤東同蘇俄的那些領導人一樣激進且冷酷無

情，但他卻積極地應和中國民間智慧和文化傳統中固有的政治力量。毛澤東經常以自己的農民背景為自豪，並以之為其政治和哲學思想的源泉。不過，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不局限於此。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發展到高峰階段時對革命同仁如此囑咐：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¹³

儘管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經常殘酷無情，但卻是在充分意識到文化資產在政治動員方面的功效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民將自己的國家和文明從遭受國際屈辱的悲慘境遇中被拯救出來的功勞盡歸中國共產黨，而這種革命性的勝利也成了今天共產主義政權驕傲自豪的源泉，及其合法性的來源。同樣，毛澤東作為革命的最高領袖，在中國的官方和民眾中間都倍受尊崇。迪莉婭·達文 (Delia Davin) 指出：

凡是研究過毛澤東主義發展歷程的任何一個品性誠實的人都不會願意作為他的辯護人。他的烏托邦夢想，時常不顧現實，他的殘酷無情以及不達目的不甘休的決心，導致人民遭受可怕的磨難。但是他領導的革命使中國實現了統一並變成世界需要衡量和顧忌的力量。中國人民銘記着這諸多成就，而我們也應如是。¹⁴

在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之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乃是將一系列文化武器進行選擇性適應轉化，以鞏固一種新的革命秩序，而這種以俄羅斯為範本的革命秩序，卻被廣泛地認為是獨特的「中國式」，而非移植自外界。毛澤東直覺明白社會運動學者歷經數代才掌握的知識，即：如同國家政權和經濟領域一樣，文化領域亦是一個關鍵的鬥爭場地。¹⁵ 運用革命修辭語言、美術、戲劇、群眾運動以及其他各種方式來建構國家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是這個轉型任務的中心。

由於全國人口九成以上都是漢民族，所以文化民族主義實踐在共產主義國家競爭中，中國具有相對的優勢。¹⁶ 讓一種新的共產主義文化同時又表現為中國式的文化相對較為直接容易，相較而言在蘇聯，一個新的蘇維埃文化並不能輕易地作為俄羅斯文化，遑論作為組成蘇維埃聯盟的多個民族的本土文化。¹⁷ 當斯大林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時，引發了可預見的民族間關係緊張。¹⁸ 但是，即使民族主義由於「蘇維埃」價值觀的加強而趨於弱化，人們對於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擔憂卻仍難以消除。根據馬克·貝辛格 (Mark Beissinger) 的觀察，「蘇維埃政權從來沒有完全消除人們對它形成的一種認識，即隱藏在其多元文化政策背後實質上是俄羅斯的強勢主導。」¹⁹

但是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在文化民族主義方面存在的差異，不光由於各自民族組成分佈情況的不同。政治領袖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及其革命戰友是毫不掩飾偽裝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手段用來修復中國失落掉的國家自豪感，並且把無產階級的訴求納入民族主義術語的框架之中。²⁰ 相比之下，「塑造了俄國工人階級文化的那些秉持民粹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源泉的社會主義者們……明確地否定了民族主義的說法。」²¹ 而在中國，那句鼓動人心的「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口號不僅成為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的中心標語，而且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歷程之中，在談論中國整個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相互關係，以及談及中國窮苦人民時，該口號反映的情緒都被革命人士和政治領袖反覆重提。²²

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以漫長的鬥爭和犧牲為代價，並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經驗所強化。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 指出，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與「文化革命」的概念相互交織在一起。不過，雖然早期的思想激進人士如陳獨秀和魯迅曾呼籲拋棄所有的傳統文化，以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毛澤東的結論卻是，他領導的共產黨多年來奮鬥從事文化革命必須考慮「人民的傳統文化中的優良部分，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和革命的特徵」，一如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發表的那番講話。²³

當然，文化革命的觀念並不是中國人的創造發明。蘇聯也階段性地提倡文化革命的必要。²⁴ 但毛澤東對於這一過程的認識與列寧或斯大林截然不同。對於列寧而言，「文化革命的目的乃是知識的灌輸以及職業道德和紀律的培養」。²⁵ 在列寧看來，文化革命是滿足工業現代化需要的一個大

眾教育工作。雖然過程中含有廣泛的宣傳動員，其目標囿於灌輸培養共產主義忠誠從而建立一個發達的經濟體。對於斯大林而言也是如此，文化革命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強調的是「政治上的外在服從以及經濟方面的紀律和工作努力」。²⁶ 這種正統的文化革命的蘇維埃概念，通過勞工教育來培養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支持。劉少奇在安源被稱為「中國的小莫斯科」時期，嚴格依照和遵循了這一做法。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繼續維護一種局限而且功利的認識。1958年春，他提倡道：「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²⁷ 於是，在安源以及中國各地興起了一場曾經在蘇聯開展過的群眾識字運動。²⁸

毛澤東則是構想一場更為徹底且武力的運動，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防止他領導的革命走向終結，要通過在青年一代中培養忠誠堅定的革命接班人來傳遞革命之火。而這一目的僅僅依靠教育和宣傳不足以實現；要實現如此目的，需要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來喚起宗教式的覺醒。誠然，毛澤東強調，針對隱藏的敵人存在階級鬥爭的需要，這一點是受到斯大林的強烈影響。²⁹ 但是斯大林發起的文化革命是由蘇聯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其他蘇共領導的機構部署的；可是在鬥劉少奇的那些工作組被撤之後，毛澤東發起的運動則是人員散漫且無法控制，持續的時間也更為長久。即使是斯大林推出的恐怖措施，譬如清洗殺戮、公審、個人崇拜和陰謀思維方式等，其嚴酷慘烈也遠遠不及毛澤東為拯救中國共產主義免於走上後斯大林時期的蘇修道路而發起的最後征戰。如同中國的整個共產主義革命一樣，文化大革命在時間跨度、範圍廣度和殘酷性上，使蘇聯這一先例相形見绌。那些被蘇聯以武力逼迫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東歐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區別更是天差地遠。此外，對於政治權威的意義這也尤其深遠重大。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國的共產主義領袖不是被當作蘇聯的代表，而是被廣大群眾視為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英雄。

就在毛澤東離世之前的一段時間裡，他向自己的心腹清楚表示自己一生的成就可以濃縮為兩個部分：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他若有所思地說儘管大多數人都會認可他前一項的成就，可後一項的結果就不得而知了。³⁰ 這個革命究竟能否真正地將中國從蘇修道路上解救出來？在蘇聯解體之後，一代人的時間又過去了，中國依然保持着共產主義政權，毛澤東辭世之前的話語尤為尖銳。

無論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崇拜還是憎惡，作最後定論為時尚早。隨着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對自身革命傳統（包括毛澤東超凡入聖的形象）的重新注重，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復又高漲。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之際，湧現了大批反映毛澤東豐功偉績的影視作品。兩年後，2011年正值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全國興起了「唱紅」運動，曾經的紅衛兵一代以高昂的熱情投入其中，在全國形成一股熱潮。如此的活動浪潮讓人們對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革命的記憶重又清晰再現，以此加強民眾對於執政黨的支持擁護。票房大片《建黨偉業》以群星志願參演為賣點，所刻畫的毛澤東及其革命志士同仁的先鋒形象不光帶有高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還富有民族主義色彩，門票在全國各院線迅速售罄。

如此的文化操控行為將許多中國人的內心打動並不意外。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發展到高峰時，精神病學家和歷史學家羅伯特·傑·利夫頓極富洞見性地寫道：

人們無法預測未來的中國領導者們對於毛澤東主義的形象持如何的態度，但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他們將繼續保持這種形象的高度聲譽，即使不再如此過度。人們還必須考慮中國共產主義文化潛在的耐久性和靈活性。我們可以預期，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痛影響將體現在超乎想像的更多方面上。然而我相信，若說最近擁有如此一呼百應的精神力量的政權會突然選擇棄之不用，將是一個草率的假設。³¹

利夫頓富有先見之明的預測，指出毛澤東和他的革命道路探索對人們有揮之不去的情感吸引力，亦是提醒我們在認識當代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支持來源時，不要作出片面簡單的理解。

許多人假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延續所憑靠的是一種工具性的「政績合法性」，一旦繁榮過熱的經濟開始變差時合法性將隨之消逝。這可能是一種幼稚的想法。³²即使經濟停滯大大加速了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衰落，我們也不能確定，經濟衰退在中國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正如本書對安源的研究試圖表明的，如果中國共產主義的力量來源於更深的源泉，並不單是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那中國共產主義的壽命就不能輕易地以其他共產主義政權的生命期來進行預測。儘管當代中國人對於政治制度的態度既複雜而又矛盾，但是他們絲毫也不會懷疑共產黨或者黨的創始人有可能含有一點點的「非中國」內容。

佩里·安德森在其最近對兩個主要共產主義革命進行比較的研究中指出，與俄國人民不一樣，中國人民的支撐力在於：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綿延至今未曾中斷過的文明，歷時數千年培養起來的自信，雖然在近一個世紀以來遭受打擊欺凌，但最終並未破壞掉……這種歷史自信奠定了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根本區別。³³

中國共產黨注重於文化訴求所享有的比較優勢，但大家不應該忘記蘇聯曾經也是在情感上和文化上獲得許多國民忠誠擁護的事實。然而，依照斯蒂芬·科特金 (Stephen Kotkin) 的分析，蘇維埃社會主義曾經一度是一種廣泛的信念，最終還是崩潰了，反映的乃是整個體系顯然無法與資本主義競爭相匹敵。蘇聯的社會主義身份認同設立為資本主義的截然對立面，一旦讓國內人民（包括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認識到生活標準和技術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世界，蘇聯就無法繼續存在。³⁴ 與此相反，鄧小平和後毛澤東時代的幾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們都願意推行經濟改革，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這樣即使未能完全消除，也會極大緩解來自另外一條道路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挑戰。至於市場經濟與威權主義的政治秩序相結合最終是否不可持續，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畢竟，這種搭配不僅讓人聯想起歷時較短的一些先例，比如朴正熙時期的韓國和蔣介石時期的臺灣；而且還會令人將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帝制歷史與之進行比較。³⁵

發掘革命傳統

中國共產主義威權體制存續至今乃是諸多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至少包括來自於廣泛的不同社會階層人民對於政權的持續擁護。³⁶ 毫無疑問，這種民眾的普遍接受認可，部分是源於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時期，生活水平在客觀上得到明顯的改善。部分也反映了共產主義黨國體制掌握着巨大的話語權和強制威力，由此使得異議政見的表達既困難又危險。在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存在的原因時，按照佩里·安德森所言，一個更為關鍵的原因也許是由於悠久的歷史而形成身份認同上獨特的自豪和驕傲給國家帶來了生命力。但是，這並非是指目前和前共產主義模式差別甚大的政體，不存在絲毫嚴重的弊病。畢竟，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合法

性不是簡單地依靠所指稱的與中國古老文明的紐帶聯繫，更是源於承諾要讓大多數受壓迫的國民以及整個國家贏得尊嚴的那場革命。而這項承諾不僅易於受到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挑戰，而且還有來自於那些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之中感到被拋棄的人們的挑戰。於是，毛澤東的符號象徵對於當代中國政權並非是一個不會導致問題的權威來源。李靜君曾描述發生在遼寧的一次示威，三萬名對待遇不滿的工人跟隨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上街遊行，「因為我們要展示過去和現在的對比。」示威者中有一名老女工「大聲感歎道，『毛主席不應該這麼快就去世！』」³⁷

許多在物質上貧困（以及富裕）的中國人，對國家在共產黨統治下取得的成就表現出強烈自豪感，比如六十多年前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但是仍有許多人對於共產黨遠離以前讓受壓迫人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革命諾言感到不滿。一個安源礦工總結了無產階級現在所處的困境：「工人的工資愈來愈少……工人權利愈來愈小。工人生活狀況愈來愈差。現在的安源工人說：從前是牛馬，現在不是人！」³⁸

由於認識到自己的歷史存在一些潛在的易受政治攻擊的方面，共產黨對於本身革命傳統的意義定論往往顯得模糊不清。關於安源的官方描述顯得既模糊含混又公式化：「安源精神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留下的寶貴財富，是集體奮鬥的結晶。」³⁹「安源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奠基之作，是中國現代史上雄偉壯麗的革命精神長河中的有機組成。」⁴⁰儘管共產黨自己總結得模模糊糊，但卻不能容忍其他的解釋方式。例如，我曾嘗試總結安源革命傳統的意義，並在亞洲研究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8 年大會上以之作主席演講，但是那次演講不被共產黨審查部門認可。演講的摘要撰成一篇文章發表在《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部分內容如下：

在安源，年輕的富有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幹部領導了一場極為成功的非暴力罷工，還面向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家人開展了達到一定規模的教育工作。其結果是民眾對於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支援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儘管「安源革命傳統」的含意由於各種各樣的個人目的、政治目的或是金錢目的而隨着歲月變得模糊含混，甚至遭到

扭曲，但是作者盡力要從共產黨的早期歷史去還原是否曾經存在另外一些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主要不是由階級鬥爭和個人崇拜驅動，而是通過發展基層組織去爭取為人的尊嚴。⁴¹

然而，中國共產黨並不歡迎其他的視角。此篇文章的中譯本在一個著名的中國學術刊物上發表之後，引起了共產黨審查部門的注意，他們給編輯發了一份言辭生硬的警告信：

《重拾中國革命》一文有不少「政治問題」，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在文章中標註了一下，這不一定是全部問題。

主要的問題：

引用禁書數本；涉及文革禁區，對文革有一些描寫犯忌；對中國革命的描述與黨的結論不同。

犯忌：對中共領袖人物毛的評價問題；對胡的話有非正面引用。涉及中共領袖人物的東西似乎是要求報審的。

對安源工人生存和思想狀況的描寫犯忌。

我懷疑把這些東西都修改或刪除了，整篇文章不會剩下什麼，不成其為完整文章，因而沒有什麼可用性了。

更不可能帶着這些問題發刊，出版社、刊物本身都會受到處理、整肅。⁴²

對於安源遺產所作的非正統解釋招致警示，這不僅反映黨國體制對於學術言論的持續掌控，也揭示出圍繞中國革命傳統進行的解釋依然是高度政治敏感。

在六四事件發生和東歐與前蘇聯的共產主義失去人民的擁護之後不久，中國的知識分子便表現出準備與他們的革命傳統分離的迫切之意。劉再復和李澤厚所著《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一書的出版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是當時人們在處理現代中國歷史和思想問題時，普遍希望超越革命問題的一個症候表現。⁴³然而，革命傳統並非能輕易地被擱置在一邊。高默波提醒大家：「中國的 1949 年革命和毛澤東主義的遺產已經變成中國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是不能簡單地被丟棄掉的。」⁴⁴由於這種傳承的歷史和意義都不受公開和如實的驗證，所以出乎意料（而且不受欢迎）的復發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那些走在前沿的呼籲中國民主變革的知識分子們，也發覺自己被革命傳統所羈絆。民主運動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對 1989 年天

安門事件進行了坦誠的回顧，他承認運動的參加者們，包括他本人在內，都受到被以往諸多習慣烙上印記的思維的妨礙：

我們用來動員群眾的大部分資源和方法，都是以前共產黨本身曾經使用過多次的。……一旦我們開始自己的革命運動，我們便變得極端自負——就好像我們回復到了文革時期，並且覺得我們自己是世上最革命的。……如果我們沒有為了民主而採取絕食行動，並且全身心地投入而且還為此付出犧牲呢？……我們發出的聲音成為了唯一的真相。⁴⁵

劉曉波的反思是在嚴厲叱責 1989 年的抗議運動並非一場民主運動，而且在不知不覺間複製了中國革命政治文化中的許多負面特點。

隨着「唱紅」以及其他一些毛澤東主義的遺留形式的興起，在「重慶模式」的推動下流行起來（近來「重慶模式」受到批評質疑），我們看到這些文化武器被用作工具來鞏固所謂的「太子黨」的聲望資格。「太子黨」全是革命元老的子輩和孫輩，他們正準備接手中國這艘大船的舵盤。⁴⁶ 這些「紅色後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作為紅衛兵初始政治的磨礪，而今這些「紅二代」在爭奪政治權位時，泄漏了自己青春期社會化的影響。儘管存在派別劃分，太子黨群體從事的目標（和個人興趣）是一致的，便是讓革命文化重新如火如荼，使之成為共產黨長久統治的載體。

中國如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革命的未來究竟如何還不得而知。一些學者預測，由於最近發生的遍佈前殖民地大部分區域的民主化浪潮，故而在二十一世紀，革命運動將會大幅減少。⁴⁷ 而另一些學者則強調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中贏家和輸家之間的不平等日益擴大，他們認為革命的變數同於以前。⁴⁸ 無論如何，顯然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席捲前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和其後 2011 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中國領導者們的擔心，他們害怕可能出現危及國內政治體制的革命威脅。⁴⁹

無論未來如何，舊日的革命歷史會以各種不穩定的方式持續影響和干擾當前的政治現狀。這一困境並非是中國所獨有。關於當代美國，吉爾·萊波雷 (Jill Lepore) 指出：「一個從革命中誕生的國家看待其歷史時一定會小心謹慎，而且焦慮不安。革命發生一次是一件好事，而再次發生就是麻煩。」⁵⁰ 在中國，上一個世紀的進程中革命反覆多次發生，在 1911 年、1927 年、1949 年、1966 年，以及依照鄧小平的論斷，還包括 1979 年，

都爆發了革命事件，因此這種焦慮就更為強烈嚴重。而且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政治秩序的批判者同擁護者一樣都使用國家革命傳統來印證己方立場的正當合理性，因為歸根結底，「任何一物都不足以勝過革命」。⁵¹ 後人們所面臨的挑戰，並不是將歷史遺忘或者加以篡改，而是在發掘革命遺產中需要突出那些激勵啟發的部分，使之克制那些可怕的暴力成分。

註釋

緒論

1. Robert Alexander,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Jill Lepore,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The Tea Party's R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over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61 (January–February 2010): 59–96.
4. "Maoist Revival Gathers Pace in Chongqing,"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1.
5. 例如，2011年春，倍受尊敬的經濟學家茅於軾發表了一篇博文，嚴厲批評毛澤東，認為他應當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多達五千五百萬中國人之死負責。此文迅速被國家部門從網上刪除了。這篇博文引起了大量的強烈反對之聲。
6. 李向平，〈信仰、權力、市場——毛澤東信仰的經濟學現象〉。載：中國宗教學術網，http://iwr.cass.cn/zjyj/201101/t20110128_6030.htm（於2012年2月2日瀏覽）。
7.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8. 關於毛澤東思想對當代政策的影響，參見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關於革命的代價，參見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及 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等。關於毛澤東本人的角色，參見 Delia Davin, *Mao Zedong* (Stroud, UK: Sutton, 1997); Jonathan D. Spence, *Mao Zedong* (New York: Viking, 1999);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Lee Feigon, *Mao: A Reinterpreta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2); Timothy Cheek, *Mao Zedong and China's Revolutions* (Boston: St. Martin's, 2002); Michael

- Lynch, *Mao* (London: Routledge, 2004); 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雖然這些作品在着重點和評價上極為不同，但是整體看來，都對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革命給予負面評價。
10.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11. 曹樹基,《大飢荒：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香港：香港國際時代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 年); Ralph A. Thaxton Jr.,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ank Diko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2010).
 12. 當然，兩國的革命有諸多重大相似之處，參見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Richard Louis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14.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 關於一些具體的其他可能方法，參見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Ilpyong J. 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Commun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 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 no. 1 (January 1984); Ann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no. 2 (April 1986): 273-86; Lisa Wedeen, "Conceptualizing Culture: Possibiliti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 no. 4 (December 2002): 713-28;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52-74.

17. 有關革命領導地位的其他方面，參見 Ronald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and Elizabeth J. Perry,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 Ronald Aminzade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6-54.
18. 關於這一具有影響力的研究的部分例子，參見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Keith Michael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 關於中國反抗文化的政治劇場的研究，參見 Joseph W. Esherick and Jeffery N.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32-69.
22. Richard Curt Kraus, *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I.
23. Ellen R. Judd, "Revolutionary Drama and Song in the Jiangxi Soviet," *Modern China* 8, no. I (1983): 127-60; 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Hinton, *Shenf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Jan Myrdal, *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65); Myrdal, *Return to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84);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及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26. Michael Herzfeld,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本書將「文化親密性」解釋為一種為文化圈內人提供「共同的社會性的保證，對於權力的基礎瞭若指掌，該權力時而允許被剝奪權利者在某種程度上巧妙地表達不恭順，又時而會加強威懾」(3)。邁克·赫茲費爾德 (Michael Herzfeld) 對希臘的研究着眼於民族國家，但是論及中國，必須考慮到國家層級之下的地方差異。
27. Elizabeth J. Perry, "Red Literati: Communist Educators at Anyuan, 1921-1925,"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pril 2007): 123-60.
28. 關於兩種特質的討論，參見 Kam Louie and Louise Edwards, "Chinese Masculinity: Theorizing Wen and Wu," *East Asian History* 8 (1994): 138-94; Kam Louie, *Theoriz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Emily Martin Ahern,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92.
30. 關於這些人 (如韓偉、王耀南、吳烈、辛元林以及其他諸人) 的回憶錄，參見：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 893-1120。這本珍貴的資料為 1922 年到 1930 年期間安源的工人運動提供了豐富的基本文獻。
31. 有關農村婦女的研究，參見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32.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eds.,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II.
33. 有關的不同視角研究，參見：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實際反思》(北京：三聯出版社，2005年)；于建嶸，《底層政治》(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2009年)。

第一章 革命預演

1. 如今萍鄉在行政區劃上已經從縣升格為市，安源被定為下轄的區和鎮一級。儘管萍鄉歸江西省管轄，但在文化上卻更接近湖南。
2. 〈萍鄉採茶戲簡介〉，載《萍鄉古今》(1984年12月)，頁 297。
3. 華文、儺曉，〈萍鄉煤炭發展概況〉，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 (1987年1月)，頁 2；李為揚，〈李壽銓與安源煤礦〉，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 (1987年1月)，頁 58。
4. 黃式國，《萍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頁 11-15。
5. 萍鄉市教研室編，《萍鄉歷史》(萍鄉：出版社未知，1995年)，頁 21。
6. 儘管太平天國運動發生於半個世紀之前，二十世紀初期大家仍津津樂道，這一點在張國燾的自傳中得到反映。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張國燾是萍鄉

人氏，幼年被學校一名老更夫講述當年參加太平軍作戰的往事所吸引：「我和其他小學生們對於那位身經百戰的『長毛』軍人異常敬重，稱許他是一位老英雄。」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14.

7. 《共產黨》(1921年4月27日)，頁3。
8.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697、699。
9. 〈萍鄉鞭炮演化史料〉，載《萍鄉文史資料》特輯(1988年9月)，頁9。
10. 彭雲華、張振初，〈解放前的萍鄉煤礦〉，載《萍鄉文史資料》第6輯(1987年1月)，頁16-21。
11. 關於李壽銓的資料主要來自李孟星，〈李壽銓軼事〉，載《揚州民革》(2005年7月)，頁1-16。此文作者為李壽銓之孫，文中資料大部分來自李壽銓本人的日記、回憶錄、詩詞以及其他文字作品。
12.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1185。
13. Jeff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Wen Lineage in Pingxiang County, Jiangxi," *Modern China* 27, no. 2 (April 2001).
14.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222.
15.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Feu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Hanyeping Coal and Iron Company, Limited,"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ed. Charles Donald Cowan (New York: Praeger, 1964), 79-110; Wellington Chan, *Politic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5).
16. 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年)，頁62-64。
17. 同上，頁46。
18. Feu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84. 雖然基本沿襲盛宣懷本人的管理風格，企業從官辦工業實體轉成股份制公司，從而完全變成一個商業性公司。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68.
19. 超過安源煤礦的，只有英國人控制的河北開灤煤礦及日本人擁有的滿洲地區撫順煤礦。Tim 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95-19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2-46.
20.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68.
21. 江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江西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47-48。
22. 1869年萍鄉縣的人口達215,648人；至1906年，人口數量翻了一倍以上，達到590,948人。載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1131。

23. 僱員人數的波動與產量的升降相一致。1916 年，安源煤礦年產量達到 95 萬噸時，僱工數量猛增至兩萬名。江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江西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頁 387、449。
24.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27、55、154。
25. 同上，頁 60。
26.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6.
27.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223.
28. 《萍鄉古今》第 10 輯(1990 年)，頁 10。
29. 〈盛宣懷致賴龍訓條〉，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1987 年 1 月)，頁 118。
30. "The Pingsiang Colliery," *Far Eastern Review* 12, no. 10 (March 1916): 377.
31. Guy Puyraimond, "The Ko-lao 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 in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ed. Jean Chesnea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13-24.
32.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年)，第一卷，頁 22。
33. 同上；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696。
34. Dian H. Murray, *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5.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696。
3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23-24；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696；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7；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5。
37. 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載《湖南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中共萍鄉礦業公司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7；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36。
38. 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62-63.
39.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57.
40.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4；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39。
41. 李孟星，〈李壽銓軼事〉，載《揚州民革》(2007 年 1 月)。
42. Samuel Yale Kupper, "Revolution in China: Kiangsi Province, 1905-191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81.
43.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44. 同上，頁 4-6。
45. 同上，頁 15。
46.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59.
47. 唐湘萍，《話說萍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60。
48. 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41。
49. 在李壽銓的詩詞中，吟詠安源的秀美風光是常見主題。〈李壽銓熱愛安源〉，載《江西文史資料》第 23 輯 (1987 年)，頁 115-17。
50. 李為揚，〈李壽銓與安源煤礦〉，頁 53-94；〈李壽銓和黃興友善〉，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 (1987 年)，頁 112-13。
51.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5；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 年)，頁 41。
52.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98。
53. 萍鄉市黨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 年)，下冊，頁 1127；楊放萍，〈安源礦警隊瑣談〉，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2 輯 (1984 年 12 月)，頁 84-86。
54. 黃式國、蕭賢富編，《萍鄉大事記》(萍鄉：萍鄉市誌辦公室，1989 年)，頁 28-29。
5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62-63；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3.
56. 劉明漢編，《漢冶萍公司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62。
5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83。
5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7；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202。
59. 黃式國、蕭賢富編，《萍鄉大事記》，頁 25-31；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93-94。
60. 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12-13。
61. 張振初，〈王鴻卿其人〉，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8 輯 (1987 年 12 月)，頁 157。
62. 中共萍鄉礦業公司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81；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81；王耀南，1967 年 8 月 21 日訪談，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這部彙編是列為「絕密」的油印本資料，收藏於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檔案室。
63. 1906 年六月，礦工罷工，抗議工作時間由原來的八小時增加至十二小時。但是這次停工行動遭到軍隊的武力鎮壓，新制度繼續施行。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52。

6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15；下冊，頁 984、1134；江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江西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頁 459。
65. 雌飛，〈安源遊記〉，載《大公報》(長沙：1922年6月10日、23日、25-26日)。
6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10。
67. 在其他礦區文化中亦存在類似的雙重性。關於波利維亞的錫礦工的傑出研究，見 June Nash, *We Eat the Mines and the Mines Eat Us: Dependency and Exploitation in Bolivian Tin M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8. Wu Yunduo, *Son of the Working Clas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5-6。
69.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221；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35-36。
70. 煥肇，〈萍西寺庵文化的特色〉，載陳世國編，《萍鄉宗教文化大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 119-24；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頁 48。
71. 《萍鄉採茶戲簡介》，頁 297-99。
72.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66、101。
73. Charlton M.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 in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ed. Jean Chesneaux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7-112。
74. 同上，頁 101。
75. 關於哥老會如何起源的各種解釋存在諸多矛盾，參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年)；陶成章，〈教會源流考〉，載蕭一山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頁 5；Jerome Chen, "Rebels between Rebellion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no. 4 (August 1970): 815；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98-100；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9年)。
76.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60-68。屬於某一個地方堂口的地盤範圍在江西被稱作為「碼頭」。這並不是經過確切界定的領土範圍，而是指該地頭領所住居處以及堂口的周邊地區。周寒僧，〈我所知道的江西洪江會〉，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1982年12月)，頁 145。
77. 關於三合會的儀式，參見 Barend J. ter Haa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Brill, 1998)。哥老會並不要求新入會成員走過密密麻麻的刀劍陣，而三合會傳統上有如此的入會儀式。
78.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104；Charlton M. Lewis,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76), 76-77。
79. 唐湘萍，《話說萍鄉》，頁 123-24。
80.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54。
81. 同上，頁 153。

82.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104;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4.
8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27。
84. Barend J. ter Haar, "The Gathering of Brothers and Elders: A New View," i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d. Leonard Blussé and Harriet T. Zurndorfer (Leiden: E.J. Brill, 1993), 259-84;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02。
85. 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如此描述他在四川的田野調查之地：「在民國時期，統稱為哥老會的秘密幫會在農村社會的各層級都行使至高的權力。」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7.
86. 有一處文獻列出江西哥老會成員的諸多職業之中，還有妓女這一行當，但所有的文獻都顯示成員幾乎全為男性。周寒僧，《我所知道的江西洪江會》，頁 148。
87. 一份十九世紀中期關於哥老會的詳細文獻中指出，成員（以「外甥」名義）養養男童提供性服務。此說有可能是為了污蔑秘密社會而存在不實之處，但有證據證明中國其他黨會中存在同性戀行為。而一些哥老會的分會，尤其是那些女性稀缺的煤礦地區，也存在這種行為並非不可能。這些關於哥老會的批評，參見〈哥老會說〉，載《辟邪紀實》（1862 年），附錄。有關於三合會的同性戀行為，參見 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8.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10。
89. 同上，頁 102、116；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
90.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55-59。
91. 對於上海勞工情況的討論，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83。
93. "The Pingsiang Colliery," 379.
94. 張軍，〈秘密社會與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載《求索》1 期（2005 年），頁 190。
95. 毛澤東初訪安源時，據說有二十幾個宗教組織在此活動。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博物館展覽。
96. 下列關於聖公會教堂在安源的活動資料來自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載《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 (1) (2004 年)，頁 109。
97. 在聖公會教堂的例子中，安源傳道區在 1909-1923 年期間歸桂湘教區管轄（總部設在長沙），但是在此階段之前以及此階段之後，都向漢口的吳德施 (Logan Roots) 主教匯報。作者感謝華中師範大學的章博釐清這個史實脈絡。

9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33-34；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04-5；《萍鄉古今》第 1 輯（1982 年 7 月），頁 122。
99. 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
100.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92。
101.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226.
102.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7.
103. 同上。
104. Clark Kerr and Abraham Siegel,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ed. Clark Ker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4).
105. 關於因經濟突然衰退而引發「相對剝奪」的研究，參見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James C.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7).
106.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在萍鄉地方文化中，獅燈分為兩種類型，反映了這種二元性。一種獅燈是紅臉，俗稱為「文獅」，在主要的慶典和節日懸掛；另外一種是黑臉，被稱為「武獅」，在武術表演時懸掛。〈萍鄉獅燈〉，載《萍鄉古今》第 4 冊（1984 年），頁 310-11。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民間宗教崇拜劃分為「文」和「武」兩種儀式，佛教徒通常負責前者而道教徒通常負責後者。John Lagerwey, *China: A Religious Sta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3.
107. Louis,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17.
108. Nash, *We Eat the Mines and the Mines Eat Us*, 169.
109. 關於另一個地理環境中，根深蒂固的反抗傳統對共產主義革命者造成障礙的研究，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二章 教導革命

1. John H. Kautsky,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Wiley, 1962);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及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年），頁 1。
4. 同上，頁 2。

5.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elen R. Chauncey, *Schoolhouse Politicians: Locality and State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6. 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Donal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8.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9.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0. 鄧中夏, 〈中國共產黨做職工運動的起點〉, 載《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3年), 頁 21-23。
11.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42-49.
12. 此信全文及對撰寫者身份的分析可見劉善文, 〈「告中國的農民」一文作者應是毛澤東〉, 載中共萍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 《毛澤東在萍鄉》(萍鄉: 萍礦工人報社, 1993年), 頁 135-50。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 《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3年), 第 1 卷, 頁 36。
13. 關於毛澤東究竟何時訪問安源和訪問過安源多少次, 以及每次陪同他的究竟是何人, 各種資料存在着諸多分歧。甚至同一作者有時候還作出相互矛盾的描述。參見: 李銳,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 頁 179; 李銳,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頁 373。本文作者曾試圖從多種資料中梳理出最可信合理的場景脈絡, 特別依據劉善文、楊桂香, 〈毛澤東到萍鄉和安源從事革命活動究竟是幾次〉, 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 頁 199-209; 以及劉善文、劉義勝, 〈毛澤東同志 1921 年秋到安源史料考〉, 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1982年 8 月 10 日), 頁 22-36。另一種說法主張毛澤東直到 1921 年 12 月才第一次到訪安源, 結伴者為李立三, 此說可參見《萍鄉今古》第 3 輯(1982年 9 月), 頁 15-22。
14.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 《萍鄉礦務局志》(萍鄉: 出版社未知, 1998年), 頁 65。
15. 《毛澤東年譜》(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年), 頁 91; 單世聯, 〈安源三人行〉, 載《地方文史交流網》(2011年 2 月 28 日)。

16.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對老工人們進行的訪談活動中，有多人回憶到毛澤東帶着一把傳統的湖南雨傘和身著藍色的文人長袍。參見：中共萍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毛澤東在萍鄉》，頁 46、51、53；以及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1985 年）。
17. 〈鄭洞國與毛主席〉，載上海《文匯報》（1985 年 1 月 13 日）。
18. 朱子健回憶錄，1967 年 9 月 15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
19. 《毛澤東年譜》，頁 91。
20. 張理全已經和在安源的四個湖南籍鐵路技師建立了聯繫，他們是他之前在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張理全定期將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二十幾份刊物給他們寄去，再由他們傳閱給其他工人。《萍鄉今古》第 3 輯（1982 年 9 月），頁 4、19。
21.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1、319。
22. 李立三，1963 年 8 月 8 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451。
23. 同上。
24.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年），下冊，頁 899、902、1059。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8。
25. 李立三，1959 年 1 月 10 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450；《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15；下冊，頁 1133；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 年），頁 104。
26. 陳柴初回憶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
2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2；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45。
2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49-51。
2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36。
3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45。
31.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 吳友生回憶錄，1971 年 4 月 24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
33.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61。
34. 同上，頁 49。
3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3。
3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47。

37. 朱子健回憶錄，1968年7月9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冊。
38. 李六如編的課本讀物最早於1922年10月印了第一至第三冊，在安源剛開始使用的是蠟紙油印本。最後一冊印於1923年5月。在一年之內，《平民讀本》連續再版四次，以滿足共產黨在江西、湖南、湖北以及廣東等省份開辦的工人學校對教材的需求。《中共黨史人物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61、131。
39. 開辦學校所需的200元和最初幾個月的行政花銷(差不多每個月40元出頭)主要來自於這兩個渠道。《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172。
40. 張振初，〈陳盛芳其人其事〉，載《萍鄉文史資料》第12輯(1990年12月)，頁134。陳盛芳在煤礦擔當了十多年的工頭，積攢了大量財富，在老家醴陵買下一大片田地，還在湘贛地區開了數間店鋪。陳盛芳成為當地數一數二的大地主和大財主，擁有相當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有時候他利用本人的影響力來幫助李立三。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9-10。
41.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64-66；《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1288；鄧啟沛，〈安源工運是我黨集體奮鬥的光輝範例〉，載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28。
4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68-70。
43.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53。
4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頁95。
4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161-62。
46.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2.
47.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47；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71-77。
48.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76。
49. 吳友生回憶錄，1971年4月24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冊。
5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97；《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78。
51.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411.
5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39。關於哥老會大佬借神力樹立權威的研究，參見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9年)，頁116-17。

53. 易友德，1967年3月20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1070; Patrick Lescot, *Before Mao: The Untold Story of Li Lisan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38-39.
54. 黃愛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發行的股票〉，載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77；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55；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載《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年)，頁 5。
55.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94-303；《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84。
56. 黃愛國，〈革命的硬骨頭：記安源煤礦老工人袁品高〉，載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59-62。
57. 易友德，1967年3月20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070。
58. 易友德，1973年10月20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103。
59.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ter 8; 陳衛民，〈1922年上海罷工運動的興起〉，載《史林》I-2 (1986年)，頁 126-35。
6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56-59。
61. 同上，頁 60-61；《毛澤東年譜》，頁 98。
62. 賀桂蘭回憶錄，1971年8月9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冊。
63.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頁 28-29。
64. 《毛澤東年譜》，頁 99。
65. 多年後，毛澤東表示從在長沙初次見面開始，他就從未對李立三熱情過。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146.
66. 郭晨，〈安源鬥爭拾零〉，載《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2-83。
67. 1896年，為開辦新的煤礦，一名特使被派到萍鄉來商談購買土地事宜，他在給官僚資本家盛宣懷的一封信中評論安源礦工們的境況「苦況甚於牛馬」。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8。關於這一比喻的更多論述，參見 S.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64-65。
69. Qiang Fang, "Hot Potatoes: Chinese Complaint Systems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Lat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 no. 4 (November 2009): 1105-35.
7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1。
71. 〈勇赴〉，載《江西工運史》第3冊 (1982年8月10日)，頁 85-91，江西工會黨委出版內部用。

72. 長沙革命紀念館、安源工人博物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 697。
73. 劉善文、胡自國、高飛和黃愛國編，〈老工人回憶安源大罷工〉，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 (1982 年 8 月 10 日)，頁 55-58。
74.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頁 29。
7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22-23。
76. 同上，下冊，頁 939；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04-5；張振初，〈陳盛芳其人其事〉，頁 135。
7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3。
7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哈爾濱：東北書局，1948 年；再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30。
79. T. Y. Chang, "Five Years of Significant Strike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1, no. 8 (June 1926): 19.
8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897。
81. 同上，上冊，頁 128。
82.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 (1987 年) 合編版，頁 177。
8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5。
84. 同上，上冊，頁 129。
85. 同上，下冊，頁 901。
8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68。
8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1。
88.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69。
89. 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24。
90. 同上，上冊，頁 122。
91. 同上，上冊，頁 126。雖然李礦長指定萍礦總局文牘科長舒季俊作為煤礦公司的官方談判代表，但是李礦長本人在幕後發號施令。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31。
92. 鄒沛、劉真，《中國工人運動史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 年) 第 1 冊，頁 217-18。
93. 〈李立三同志有關安源工人運動的談話〉，載《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50。
94.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78；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77。

95. 譚九如,〈萍鄉基督教的歷史與現狀〉,載陳世國編,《萍鄉宗教文化大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12-16;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載《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1)(2004年),頁109-10;詹海烈,〈江西基督教聖公會史話〉,載《文史大觀》第1期(1995年),頁40-45。
96. John Fitzgerald,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Dig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The Dignity of Nations: Equality, Competition and Honor in East Asian Nationalism*, ed. Sechin Y. S. Chien and John Fitzgera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114.
97. S.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8.
98. 關於安源當地人參與其中的情形,參見《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150;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2卷,頁184;陳琨修、劉謙編纂,《民國醴陵縣誌》(再版,醴陵:醴陵市地方誌委員會,1987年),頁901。
99. John Gavent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116.
10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40。
101. 同上,下冊,頁840-59。
102. 此處零散地摘錄了這部長篇押韻民歌的部分小節片段。
103. 引自 Robert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225-26。關於「彭菩薩」的稱呼,參見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86; and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121.
10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07。

第三章 中國的小莫斯科

1.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頁2。
2. 《萍鄉古今》第5輯(1985年),頁52。
3.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940-41。
4. 其中一個障礙可能是劉少奇在莫斯科時對於所學的知識領悟有限,據說他的俄文程度薄弱。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1), 201.
5. 入會費相當於工人的日薪,這一項使俱樂部獲得1,500餘元的收入,而月費(也是相當於工資的一定比例)也使得每月增加了一筆480元的額外收入。
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27。
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1060。

8. 同上，下冊，頁 900。
9. Rex A. Wade, *Red Guards and Workers' Militia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0, 159.
10. 關於保甲的內容，參見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關於萍瀏醴起義的情況，參見本書第二章；關於五四運動的內容，參見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6-67。關於中國帝制晚期階段的「正統」組織和「叛逆」組織在結構設置上類同的研究，參見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pter 3.
1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4-95、141。
12. 關於秘密會社的類同相似性，參見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載《湖南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13.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年) 第 1 卷，頁 91。
1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7。
1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02。
1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9。
1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9。
18. 同上，上冊，頁 141。
19. 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籍貫在他們到異鄉開展組織活動中發揮的作用的研究，參見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02-3。
21.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59。
22. 韓偉回憶錄，1968 年 7 月 18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92；《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03。
23. 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 年)，頁 166。
24.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2-33；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67。
2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29。
2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94-95。
27. Victoria Bonnell, *Iconography of Power: Soviet Political Poster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39。
29.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209.
30. Chang Kuo-t'ao,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i; quoted in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0.
31. Chang Kuo-t'ao,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
3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0。
33. 同上，上冊，頁 99。
34.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181。
35.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08-9。
3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1。
37. 萍鄉市總工會、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畫冊》(安源：出版社未知，1982 年)，頁 25、29。
3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21-22。
39. 同上，下冊，頁 920。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56、186；《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26-29。
41. 李立三之前借給俱樂部共 90 元，俱樂部在開張後不久就償還了 80 元。《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27-28。
42. 同上，下冊，頁 894。
43. 同上，上冊，頁 93。
44.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John Day, 1945), 40.
4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78、347。百分比依據原始資料數據重新計算得出。
46. 同上，上冊，頁 290-95。
47. 劉家林，〈二十年代安源工人教育〉，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1982 年 8 月 10 日)，頁 48-49。
48. 黃愛國，〈安源路礦工人讀書處〉，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294。
4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79-81。
5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1-32；鄧啟沛，〈安源工運是我黨集體奮鬥的光輝範例〉，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3；

- 楊放萍、黃愛國，〈劉少奇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貢獻〉，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8；《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11，下冊，頁 1215。
51. 儘管安源路礦兩局僱傭的工人皆是男性，但其中一些工人將他們的妻子安置在煤礦附近。
 5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99；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1；《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69、342。
 5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08。
 54. 同上，下冊，頁 868-69。
 55. 楊放萍，〈略述安源工運中黨對工人之教育〉，載《黨史通訊》第 2 期（1987 年），頁 12；《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69。強迫抗拒學習的文盲工人去上課亦是布爾什維克政策，列寧在 1919 年 12 月法令中規定了這一條款。參見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0.
 5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46-47。
 57. 同上，上冊，頁 104。
 58. 同上，下冊，頁 782。黃愛國，〈安源路礦工會教育股編印的「小學國語教科書」〉，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文匯》，頁 379-81。
 59. 吳運鐸在自傳中談到，1925 年，他當時十歲，在共產黨為安源煤礦工人子弟開辦的一所學校上四年級。Wu Yunduo, *Son of the Working Clas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16. 保爾·柯察金是著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角，作者為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 (Nikolai Ostrovsky) (1904-1936)。
 6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28-38。
 61. 同上，下冊，頁 821-22。
 62. 同上，下冊，頁 1001。
 63. 有關這個標準在中國的突出重要性，可參見 Donald J. Munro, "Egalitarian Ideal and Educational Fact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 John M. H. Lindbeck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Susan Shirk, *Competitive Comrad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and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作者從斯蒂夫·史密斯認為蘇聯並無類似機制這一觀點中大獲裨益。
 64.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61。
 65. 晏資明，〈中共最早的地方黨校〉，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292-93；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0；楊放萍，

- 〈略述安源工運中黨對工人之教育〉，頁 14；萍鄉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校》(萍鄉：萍鄉教育出版社，2004 年)。最後者為內部參考資料。
6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14-19。
 6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86。
 68. Vladimir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 (London: Routledge, 1998), 84-93.
 69.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3。
 70.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56。
 7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19。
 72. 吳烈，〈憶安源路礦工人革命運動〉，載《萍鄉黨史通訊》第 3 期(1985 年)，頁 16-17。
 7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32-33。
 74. 同上，下冊，頁 1014。
 75.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58.
 7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41。
 77.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2、162。
 7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22。
 7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3。
 80. 同上，下冊，頁 946。
 81. 賀大衛 (David Holm) 注意到這種連續性的存在，他指出在延安時期，共產黨便舉辦各種大型的群眾慶典活動來紀念歷史上的那些起義，意在宣稱自己乃是天命所歸。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33.
 82.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139.
 83. 關於共和模式的內容，參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72。
 85. 《萍鄉古今》第 6 輯(1985 年 5 月)，頁 8-9、33；第 8 輯(1987 年 3 月)，頁 31。
 86. 《萍鄉古今》第 6 輯(1985 年 5 月)，頁 26。
 87.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4.
 88. 李立三任上海總工會的委員長，劉少奇任總務科主任。上海總工會指導了五卅運動的總體方向。當時李立三充分利用在安源積累的經驗，同秘密會社的頭領結成重要聯盟。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1.

8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90。
9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53。
91.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28-31。
9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55。幾乎一百名被開除的人之後都復職。
93.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2-33。
94. 同上，頁 233-34；《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98。
95.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合編版（1987 年），頁 79。
96.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頁 45；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85-86。
9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63。
9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45-46；《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96-97。
9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00。
100.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44-45。
101. 《萍鄉煤礦發展史略》，頁 77-84；《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272-88。
102.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31。
103.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 年），頁 89。
104. 《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年），下冊，頁 262。
10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66。
10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49-50；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37-38；萍鄉市委宣傳部編，《劉少奇在安源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38-40。
107.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30。
108. 同上，頁 133。
109.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98。
110. 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769-71。
111. 李立三回憶錄，1963 年 6 月，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4。
112.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07。
11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0。
11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65；《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5-36。

115. 劉善文、黃愛國，〈李立三在安源史料述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文匯》，頁 276-77；《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44。
116. 《劉少奇論工人運動》，頁 216。
11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8。
11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67；《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4-35。
119. 這些細節見於安源黨史專家黃愛國對袁品高進行的系列訪談。袁品高曾經擔任過劉少奇的保鏢，也是謝懷德統領的工人糾察隊隊員。在萍鄉黨校與黃愛國進行的訪談，2009 年 10 月 23 日。
12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7、100。
121. 同上，上冊，頁 237-51。
12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42-44。
12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34。
124. 謝家俊，〈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禁賭〉，《萍鄉黨史通訊》第 1 期(1990 年)，頁 40。
12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35。
126. 同上，上冊，頁 159。
127. 同上，上冊，頁 198。
128.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84-88。湖南鄉紳對李壽銓感激不盡，這點在隆重的送別贈禮上得以反映：一尊他本人的巨大的陶瓷半身像，多幅湖南繡品(此地以出產刺繡而聞名)，其中一幅罩上玻璃的巨大刺繡畫像，需要四人抬着，因過重而無法掛於家中的牆上。
129.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00；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劉少奇在江西》(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頁 2。
130. 關於聖公會牧師和罷工工人之間關係友善的資料，可參見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載《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1)(2004 年)，頁 109；詹海烈，〈江西基督教聖公會史話〉，《文史大觀》第 1 期(1995 年)，頁 40。
131. Walworth Tyng, "The Miners' Church at Peaceful Spring: Among the Collieries and Coke Ovens at Anyuen—A Vivid Picture of Our Work in a Little Known Part of the District of Hankow," *The Spirit of Missions* 90 (1925): 477.
13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01-3。
133. 劉家林，〈二十年代安源工人教育〉，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1982 年 8 月 10 日)，頁 50-51。劉少奇的反基督教工作其實是當時國共兩黨共同掀起的浩大的反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參見 Jessie G. Lutz,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0, no. 3 (1976): 395-416；在同一時期，蘇聯也展開了類似的反俄羅斯東正教的

- 運動。參見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93-107; Daniel Peris, *Storming the Heavens: The Soviet League of the Militant Godl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28.
134.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63-99。
- 135.《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50。
13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71-75;《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41-42。
137. Letter from J. Calvin Huston (April 23, 1925), quoted in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104.
13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78-91。
139. 同上,頁 192-93;于建嶸,《嶽村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 142-70。
- 140.《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80。
141. 龔逸情,〈關於安地工作失敗後同志被捕經過的詳細情況報告〉,《萍鄉黨史通訊》第 4 期(1985年),頁 7-8。
- 142.《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526、574。
143.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74;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58-62。
- 144.《申報》,1825年10月21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217-19。
- 145.《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7。
14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66-72;黃愛國,〈安源九月慘案的經過〉,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文匯》,頁 298-304;《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574;下冊,頁 913、1340。
- 147.《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31。
14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73;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83;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59。
149. Chang Kuo-t'ao,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iv.
- 150.《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09-10。
151.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1。
152.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53. V. I. Lenin, "On Cooper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2nd English ed.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33: 467-75.
154. Peter Kenez 指出有一些蘇聯農民對管理該村閱讀室的負責人和他們的政治教育工作充滿敵意,致使他們及其家人受到人身傷害。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141. Vladimir Brovkin 認為蘇聯村民「憎惡圖書館,將其視為反宗教的運動中心場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展的破除傳統、習俗、生活

- 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戰線運動最後黯淡收場。」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92, 107. James von Geldern 觀察到，在同一時期「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認為應當閱讀的讀物和人民願意閱讀的讀物的問題上，存在着無休無止的鬥爭。」James von Geldern, "Introduction," in *Mass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 ed. James von Geldern and Richard St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xvi.
155. Kam Louie and Louise Edwards, "Chinese Masculinity: Theorizing Wen and Wu," *East Asian History* 8 (1994): 138-94.
156.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2001.
157. 劉少奇，〈二七失敗後的安源工會〉（1925年4月），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446。
158.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159. 〈敵「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摘錄〉，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選編》第2卷第6期（1984年），頁26。此為未出版的原始資料合輯，收藏於安源紀念館檔案室，被定為「絕密」材料。
160.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1921至1925年間超過3,280名工人、3,180名兒童和100名婦女從安源的共產主義學校畢業。楊放萍，〈略述安源工運中黨對工人之教育〉，頁17。

第四章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1.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上冊，頁526-27；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頁261-62。
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65；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年），頁180。
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539。
4. 同上，上冊，頁542。
5. 同上，下冊，頁915。
6. 同上，下冊，頁921。
7. John W. Lewis, "Leader, Commissar and Bureaucrat: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in Crisis*, ed.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 I, book A: 449-81;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532-33。

9.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68-70。
1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574。
11. 同上,上冊,頁 659。
12.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49。
1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84。諸多曾經在安源工人學校學習過的其他煤礦工人延續了類似的模式,他們在廣州受訓,然後在北伐中被派回湖南家鄉進行軍事宣傳和組建農民協會。這些工人包括袁德生、袁德喜、湯正倫、朱昌炎與趙國城等。諸人的生平簡介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94-1405。
14.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史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65。
15. 蔣介石本人在 1926 年 9 月 20 日當天的日記中提到了這一事件,日記藏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本書作者感謝蘇成捷 (Matthew Sommer) 和謝美裕 (Hsieh Mei-yu) 幫助找到此篇日誌。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在 1926 年 11 月 13 日致董事會的一封信中談及蔣介石所作的演講。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58;以及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84-85。
1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8。
17.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卷,頁 199-200。
1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58;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82。
19. 〈湘區書記報告〉,載《中共中央文件選編》(1926年10月22日)(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第2冊,頁 297。
20.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95.
21. Mao Zedong, "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I: 28.
22. 同上, I: 46。
23. Zhang Baohui, "Commu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easant Revolutions in South China, 1926-1934," *Theory and Society* 29, no. 5 (2000): 702.
24.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234-37.
25.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81-82。
2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9。
27.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80-82.
2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82-83。
29. 同上,頁 291-92。

30. 同上；高飛，〈槍斃大惡霸地主葉紫屏〉，載《萍鄉文史資料》第2輯（1984年12月），頁136-38；〈萍鄉人民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暨特別法庭〉，載《萍鄉黨史通訊》第3期（1988年），頁42-44。
3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1031。
3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93。
33.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頁215-16。
34. Christina K.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35.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191。
3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219。
37. 〈萍鄉煤礦工人管理礦山〉，載《萍礦工人報》（1998年6月11日）。再版：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18-20。
3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1243。
3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606-7. 張國燾之言的準確性遭到質疑，見唐純良，《李立三全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03-5。無論李立三父親的真實命運如何，毫無疑問革命活動在湖南醴陵縣製造的恐怖極端嚴重。
40. 關於「四一二事件」的敘述，參見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NH: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1991), chapter 15.
41. 幸元林，〈安源工人革命鬥爭片段回憶〉，載《萍鄉黨史通訊》第6期（1985年），頁16。
4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98-307。
43. Roy M.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3.
4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636。
45. 同上，上冊，頁657。
46. 江西省文化廳、安源工人運動博物館編，《秋收起義在江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頁24。
47. 關於此過程的研究，參見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4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275。
49.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萍鄉文史資料》第6輯合編版（1987年），頁26-32。

50. 江西省文化廳、安源工人運動博物館編，《秋收起義在江西》，頁 31。
51. 同上，頁 32。
52. Walworth Tyng, "Difficult Days in Hunan: Veteran Missionary Gives Vivid Picture of Unrest in China as Governments Change," *The Spirit of Missions* 92 (1927): 71.
53.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333。
5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644。
55.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334-37。
56. 〈敵「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摘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選編》第 2 卷第 6 冊 (1984 年)，頁 26。此為未出版的原始資料合輯，收藏於安源紀念館檔案室，被定為「絕密」材料。
57. 關於這段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互相模仿的研究，參見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chapter 3.
58. 〈我所知道的「安源工人反共委員會」〉，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12 輯 (1990 年 12 月)，頁 109-10。
59. 〈敵「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摘錄〉，頁 136-37、171-72。
60. 同上，頁 170-71。
6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95-96。
62.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寫作組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 年)，上冊，頁 121。
63.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一卷，頁 62。
6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374。
65. 引自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323-34。
66. 《聖公會報》第 24 卷第 6 期 (1931 年 3 月 15 日)，頁 10-11。
67. 王耀南，1967 年 8 月 21 日訪談，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選編》第 3 卷第 1 冊。
68. 劉榮華，1969 年 5 月 24 日訪談，載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1254。
69. 徐桂生，〈青洪幫發展簡況及其在萍鄉的活動〉，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12 輯 (1991 年 12 月)，頁 76。
70. 《萍鄉安源煤礦調查報告》(南昌：江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1935 年)，頁 168-72。收藏於上海市圖書館。
71. 關於戰時接管一些重要企業的情況，參見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hua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2. 關於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當時政府經濟管理事務中的作用，參見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73.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451。
74. 同上，頁 459。
7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478。
7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504。關於《紅色安源》不同版本的更多情況，參見第五章。
77. 萍鄉市工會編纂委員會編，《萍鄉工會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9年)，頁 38。
78. 萍鄉市委編纂委員會編，《萍鄉人民革命鬥爭史》(萍鄉：出版社未知，1962年)，頁 153。關於平江事件，參見 Gregor Benton, *The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9. 國家歷史檔案館(臺北)，檔號 003-010305-0205。資料中包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從 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3 月期間關於安源地區非法私人採礦活動重現的報告。
80. 萍鄉市工會編纂委員會編，《萍鄉工會志》，頁 38。
81.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 16。
82. 萍鄉市委編纂委員會編，《萍鄉人民革命鬥爭史》，頁 153-54。
83. 同上，頁 155。
84. 同上，頁 156。
85. 同上，頁 156-57。
86. 同上，頁 158、166-67；《安源煤礦史》(長沙：湖南師範學院，1958年)，頁 156。
87.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1-29.
88. 1930 年 11 月 16 日，一封來自共產國際的信件，批評李立三在未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下盲目攻打城市的做法，犯了冒險主義路線的錯誤。這一批評迫使李立三在 11 月 25 日從中共政治局辭職，不久後離開中國。Derek J. Waller,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es of 1931 and 193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3), 16.
89.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146.
90. 引自劉濤和劉允真，〈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1967 年 1 月 2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大學服務中心，2002年)。
91. Anna Louise Strong, *China's Millions*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28), 100.
92. 同上，頁 103-4。
93.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John Day, 1945), 32-33.

94. 于建嵘，《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 67-68。
95.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221. 關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的對比，參見頁 278-79。
96. Robert 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97. 如賀大衛 (David Holm) 觀察到，奠定了日後紅軍文化生產基礎的江西蘇維埃時期的戲劇和音樂，深受湘贛南部地區傳統的影響。
98. 關於「紅色劇院」對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性，參見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19-25.
99. 有關蘇聯工人文化宮的描述，參見 John Dewey,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9). 儘管中國的這種機構以蘇聯為效仿對象，但是在其場所內舉辦的文化活動顯然帶有很鮮明的地方特色。
100. Paul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07, 172-73.
101.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20.
102.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228-31.
103.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55.
104.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9), 63.

第五章 築造革命傳統

1.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 17。
2. Richard Curt Kraus, *The Party and the Arty in China: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37, 48-49.
3.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7.
4. Julian Chang, "The Mechanics of State Propagand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50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76.
5. 1951年1月，上級任命一名叫宋維靜的女性來接替郭象豫的萍鄉礦務局局長之職，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此人實際上並未到任，郭象豫繼續管理大權。同年後一時期，當礦務局黨委會重組後，郭象豫的權力被大為削弱。即使如此，郭象豫仍然繼續留任一年，直至1952年6月。參見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18、711。因國民黨時期殘留影響的存在，新建

- 的秩序並不平靜。根據萍鄉公安局的資料，在解放後最初的四個月內，一共逮捕了 140 餘名「惡霸」，被抓獲或槍決的國民黨成員、員警和「土匪」達到 1,043 名。參見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9。這是一份內部資料。
6.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17；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油印手稿，長沙，1958 年 12 月，頁 158。
 7. 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63。
 8. 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no. 1 (January 2002): 80-105; Yang Kuisong, "Reconside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hina Quarterly* 193 (2008): 102-21.
 9.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58-69。
 10. 關於上海工廠發生的運動，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在萍鄉，在這場運動中受到攻擊的人數略高於該縣 5% 的人口。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64。
 11. 當時發生了成千上百以幫會為基礎的反抗共產主義新政權的事件，幾乎遍佈全國各地。關於此類事件的匯編，參見趙嘉珠主編，《中國會道門史料集成》上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上冊，頁 599-600 有關於萍鄉的討論。
 12. 文云成、史宗正，〈「華中反共救國軍」的產生及其滅亡〉，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7。
 13. 〈張光馨的自白〉，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68-69。
 14. 文云成、史宗正，〈「華中反共救國軍」的產生及其滅亡〉，頁 9-10；王中民，〈「華中反共救國軍」在萍鄉煤礦的覆滅〉，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46。
 15.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年)，頁 899；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72-73。
 16. 〈周學芝的自白〉，《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67；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898-99。
 17. 王中民，〈「華中反共救國軍」在萍鄉煤礦的覆滅〉，頁 44。
 18. 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76。
 19.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0。
 20. 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158-72。

21. 根據公安局的地方誌，直到 1986 年萍鄉才又出現一次有預謀的叛亂。該年中，一個千禧主義佛教組織龍華會，成員有 48 名，來自湖南和江西兩省，他們被當作「反革命」叛亂團伙而遭到取締。同上，頁 74-75。
22.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1-63。
23.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26。
24. 同上，頁 463。
25. 朱訓編，《中國礦業史》(北京：地質出版社，2010 年)，頁 192。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72。儘管劉少奇回信上的日期並沒有標注出年份，根據某些資料顯示，這封信的時間是在 1953 年或者更晚，但是當地的黨史專家廣泛認同信件年份為 1952 年。
27. 同上，頁 463。
28.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204。
29.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2-23；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北京：出版社未知，1967 年)，頁 17。
30. Feng Chongyi, "Jiangxi in Reform: The Fear of Exclus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ed. Hans Hendrichske and Feng Chongyi (London: Routledge, 1999), 256.
31.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由上海東方紅電影製片廠製作的文化大革命傳單，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32. 參見彭江流的文章，《萍鄉古今》第 2 輯 (1982 年 8 月)，頁 108。
33.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6-67；中共萍鄉煤礦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年)，頁 357；《萍鄉日報》(2004 年 9 月 26 日)。
34. 中共萍鄉市委黨史辦公室，《萍鄉英烈》(萍鄉：萍鄉出版社，1986 年)，頁 72-77。
35. 中共萍鄉煤礦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1961 年版)，頁 357-58。
36.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7。
37. 朱培鈞，〈訪安源煤礦〉，載《旅行家》第 3 期 (1956 年)，頁 7-8。
38. 《紅安戰報》(1967 年 7 月 5 日)，紅衛兵報紙，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39.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7-68。
4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202。
41. 《人民日報》(1949 年 9 月 22 日)。

42. 劉少奇，於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的講話，載《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第 1 卷，頁 421。
43. Elizabeth J. Perry, "From Native Place to Workplace: Labor Origins and Outcomes of China's Danwei System," in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Lu Xiaobo and Elizabeth J. Per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44. Elizabeth J. Perry, "Masters of the Country?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Early PRC,"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9-79.
45. 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C1-2-240。
46. 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3。
47. Paul Harper,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37 (1969): 96. 也可參見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chapter 1.
48. 劉少奇，〈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載《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407。
49. 李思慎，《李立三之謎》(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年)，頁 337-53。
50. 關於這次罷工潮的起因及結局，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51. 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C1-2-2255.
52.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4。
53.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載《新北大》第 6 期(1967 年 4 月 25 日)。收錄於 Yuan Zhou, ed.,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1), part 1, vol. 15, 7195.
54. 關於這個故事的不同版本，參見白陽編，《安源工人鬥爭故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4 年)，頁 15-20；《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年)，頁 36-42。
55. 〈萍鄉採茶戲簡介〉，載《萍鄉古今》第 4 輯(1984 年 12 月)，頁 300。
56. 陳煥聲，《1922 年安源大罷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6 年)。1959 年出版了這個戲劇的一個略長版本，其中簡略提及毛澤東和李立三兩人，但是戲劇的高潮部分仍然是劉少奇代表工人出面英勇地與資方進行談判。蕭松，《安源大罷工》(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57.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年)，下冊，頁 1270-72。
58. 同上，下冊，頁 897。
59.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

60.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紅安戰報》第 16 期（1967 年 6 月 30 日）。
61.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
6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205。
63. 參見張振初 1960 年 7 月 4 日撰文記載的安源工人們講述的劉少奇在安源的故事。
64. 《萍鄉市政府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年），頁 192。
65.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9-91。
66. 同上，頁 216。
67.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4。
68.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頁 45。
69.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583。
70. 關於「百花齊放」運動和隨後的反右運動的背景，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Merle Goldman,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1.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78-82。
72. 同上，頁 217。
73.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頁 23。
74. 蕭建萍，〈都是「燎原」惹的「禍」〉，載《大眾電影》第 8 期（2005 年）。
75. 袁品高的聽眾並不限於遊客。1962 年萍鄉市工會安排袁品高到當地多個工廠作報告，講述 1922 年大罷工的事跡，聽眾超過兩萬名工人。《萍鄉市工會志》（萍鄉：萍鄉出版社，1999 年），頁 192。
76.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209。
77. 同上，頁 209-13。
78. 同上，頁 188-202。
79. 同上，頁 220。
80.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457-63。
81.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載《萍礦工人報》（1998 年 9 月 24 日）。收錄於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36。
82.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合編版（1987 年），頁 140-41。
83. 南昌市檔案局，（機密資料）檔號 5018-18-1。
84. 《反修戰報》第 1 期（1967 年）。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85. Paul Clark,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86. 2006年6月作者在南京訪問蔡少卿，蔡少卿曾經是北京大學安源工人運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還在北京採訪了二十餘名參軍之前曾在安源做過工的老軍人，並對中央檔案館的人事檔案卷宗做過資料收集。根據蔡教授敘述，研究初稿被送達鄧拓和其他高級主管幹部。然而，由於當時政治氣候複雜多變，這個研究項目一直未完成，也未出版任何文字。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450。研究組 1959年1月10日訪談李立三的記錄稿，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96-901。
87.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
88.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7。
89. 《紅色曙光》第 8 期（1967年4月30日）。紅衛兵報紙，萍鄉市圖書館收藏。
9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1959年版），頁 5-10。
91. 《萍鄉市工會志》，頁 283。
92.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8。
93.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1961年版），頁 359-60。
94.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1959年版），頁 618-20。
95. 劉少奇和毛澤東皆是鑄成大躍進之人，儘管二人的着重點截然不同（劉少奇強調黨組織的必要性，而毛澤東注重群眾的自發性）。有關資料詳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96. 《中國工運史料》第 2 期（1958年），頁 134。
97. 《湖南歷史資料》第 1 期（1958年），頁 4。
9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1-104，印有劉少奇文章的最初版本。
9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9-43，印有此文章的最初版本。
100. 《劉少奇在中共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1959年9月9日），頁 10-12（油印版收藏於哈佛大學 Fung Library 圖書館）。劉少奇本人對於斯大林式領導風格的推崇實際上由來已久。1937年3月4日他在給張聞天的信中寫道，「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我們的政治經驗還幼稚，還要虛心學習。事情還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廣益，建立真正的集體領導，更多的請示國際。」《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年），頁 1。
101.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當地的歷史學家和宣傳家彭江流曾編寫了另一版本的民歌，其中李立三（李隆邨）被毛澤東（毛潤之）代替。其開篇詩句為「直到 1921 年，忽然霧開見青天，有個能人毛潤之，打從湖南來安源。」《萍鄉古今》第 6 輯（1982年8月），頁 112。

102.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7-8。關於 1925 年的最初版本，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40-59；及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71。與 1925 年版本相比，這首民歌的 1955 年版本賦予劉少奇更主要的角色，但誇大程度仍遜於 1959 年版本。1955 年版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26-39。
103.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劉少奇在江西》（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8 年），頁 152-59。
104. 萍鄉市委編纂委員會編，《萍鄉人民革命鬥爭史》（萍鄉：出版社未知，1962 年），頁 29。
105. Julia F.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42-43.
106. Ellen Johnston Laing,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8.
107. 《美術風雷》第 1 期（1967 年），頁 10-14。
108.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40.
109. Victoria E. Bonnell, *Iconography of Power: Soviet Political Poster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62.
110. 同上，頁 165。
111. 侯一民，〈劉少奇和安源礦工的構思〉，載《美術》第 4 期（1961 年），頁 21-22。
112.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28.
113.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8、694。
114. 楊公敏，〈電影「燎原」拍攝追憶〉，載《劉少奇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326-28。
115. 電影《燎原》，天馬電影製片廠，上海，1962 年。
116.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8。
117.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
118. David Brandenberger, "Stalin as Symbol: A Case Study of the Personality Cult and Its Construction," in *Stalin: A New History*, ed. Sarah Davies and James Harr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0.
119. 同上，頁 251-70。
120. 蕭建萍，〈電影「燎原」風波始末：雷煥覺就是劉少奇？〉，載《大眾電影》第 8 期（2005 年）。
121. 《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50。
12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6-10。

123.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4-85。
12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94-95。
125.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8。
12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內容介紹》。雖然並無出版日期和地址，但是根據其文字內容，這本小手冊應是 1965 年紀念館開放時出版。收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127.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217、218。
128. 朱子金以為李立三當時仍擔任勞動部部長，於是便將她的第一封信（1965 年 6 月）寄至此地址。直到 8 月一位中央官員訪問安源紀念堂的時候，她才得知李立三被降職為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然後她再次致信，並寄至新的地址。從北戴河海濱療養院休養三個月返回北京後不久，李立三便回覆了這兩封信。同上，頁 216。
129. 同上，頁 218。
130.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小型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 年 12 月 20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大學服務中心，2002 年）。
131. 毛澤東，〈關於四清運動的一次講話〉（1965 年 1 月 3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2. Mao Zedong, "Talk on the Four Cleanups Movement," *Long Live Mao Tse-tung Thought*, January 3, 1965.
133.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158.
134. 朱少連已經犧牲幾十年，故而在這些互相批鬥成風的時期，這無疑有助於他的革命名節。一直有一個謠傳，說他同許多安源原來的積極分子一樣在白色恐怖時期投靠了國民黨。1959 年 1 月，北京大學數名歷史學家詢問李立三，朱少連是否背叛過革命，李立三回答，「聽人說，被捕以後叛變了，叛變到什麼程度不知，可能拷打後，供出機關、名單，大的叛變恐怕不大，可能有叛變行為，具體情況不知道，後來就槍斃了。」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A12-27-27 (1)。所出版的李立三訪談的數個版本都省略了這些講話。
135. 據萍鄉礦務局報告，從 1950 年到 1965 年期間，為 7,665 名礦工及家屬建造新住房達 181,292 平方米，耗資近 750 萬元。同一時期，另外還為 6,227 名單身工人修建了新宿舍。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608、612。
136. 同上，頁 613-16。
137.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209。

138.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671-77。
139. 同上，頁 302、599。
140. 關於毛澤東時期中國進行的工業烏托邦的失敗行動，參見 Li Hou, "Urban Planning in Mao's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aqing Model,"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41.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頁 86。
142.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2-33.
143.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44.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23.
145.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87).

第六章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

1. 關於這段時期的政治歷史，詳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Haiyan Lee, "The Charisma of Power and the Military Sublime in Tiananmen Squar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no. 2 (May 2011): 405.
3. Timothy L. Smith, *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William Fishwick, *Great Awakenings: Popular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Haworth Press, 1995); Thomas S. Kidd, *The Great Awaken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213-14；李紹洲，〈我們的「安展」〉，收於李紹洲的系列回憶文稿《身繫非常歲月》，參見 <http://lishaozhou417.blog.163.com/blog/static/126614511200910196651287/> (李紹洲的個人博客)。
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36。
6.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215。
7.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1966 年 11 月 19 日)；《陳伯達、江青接見航空學院紅旗展示的講話》(1966 年 12 月 13 日)。兩份資料均來自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大學服務中心，2002 年)。

8. 許多到訪煤礦的人即使是乘坐火車而來，也還是要沿着崎嶇陡峭的山路步行去井岡山。2009年7月與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的私人談話。由於她當時是在北大五七幹校，於是在1970年到訪過安源。
9. 關於毛澤東革命魅力的神學解讀，參見 Christian Sorace, "Saint Mao," *Telos* 151 (Summer 2010): 173-91.
10. 戚本禹，〈戚本禹對「批判陶鑄聯絡站」的指示〉(1967年2月9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215。安源老居民的回憶則明確表示那些樹在建造工人俱樂部之前就已經生長在那裡，來源同劉少奇無關。參見朱子健，1967年12月15日訪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第3卷第1冊(1975年)。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北京：出版社未知，1967年)，頁47。
13. 蕭建萍，〈都是「燎原」惹的「禍」〉，載《大眾電影》第8期(2005年)。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其中有樹被砍伐並重新植樹的照片。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215。
16. 黃愛國，〈革命的硬骨頭：記安源煤礦老工人袁品高〉，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368。
17. 關於三家村的資料，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chapter 11.
18.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載《新北大》第8期(1967年4月25日)。
19. Feng Chongyi, "Jiangxi in Reform: The Fear of Exclus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ed. Hans Hendrischke and Feng Chongyi (London: Routledge, 1999), 257.
2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頁436-37。
21.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萍鄉：萍鄉市地方誌辦公室，1989年)，頁86。
22. 〈周恩來、姚文元接見江西省四方代表講話記錄〉，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3. 〈中央首長接見江西四方面代表談話摘要〉(1967年8月3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4. 中共萍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萍鄉黨史大事記》(萍鄉：出版社未知，1955年)，頁179。
2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86。
26. 《紅旗》(1967年5月20日)。轉載於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下冊，頁297。
27. 同上。
28. 同上，下冊，頁806。
29. 李立三6月5日寫給江青的信收錄於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下冊，頁806-9。1970年秋天，《人民日報》文藝部在回覆安源紀念館的詢問中聲稱，他們刊登李立三1963年寄來的電影評論時未作任何刪節或修改。然而，由於按照報社的標準規章並不保留原有手稿，《人民日報》的人員稱無法找到李立三投來的原始稿件。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A12-27-27(2)。
30. Patrick Lescot, *Before Mao: The Untold Story of Li Lisan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327.
31. 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下冊，頁817收錄了此信。
32. 李立三的家人堅持說他本人並無自我意願服下致死的過量安眠藥。同上，下冊，頁819-29；Lescot, *Before Mao*, 344-48.
33. 《人民日報》，1967年5月8日、1967年8月5日和1968年4月22日；《解放日報》，1967年8月15日、1968年6月23日和1968年7月1日；《文匯報》，1967年5月21日、1967年8月22日和1968年7月3日。同時參見《解放軍日報》，1967年7月29日，《北京日報》，1967年5月11日，及《江西日報》，1967年10月22日。
34. 楊公敏，〈電影「燎原」拍攝追憶〉，載《劉少奇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328。
35. 《夏衍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403。
36. 《紅色曙光》第9期(1967年5月11日)。這份紅衛兵報紙是在萍鄉出版的，由萍鄉市圖書館收藏。
37. 《聯司號叫》第10期(1967年9月14日)。這份紅衛兵報紙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38. Ellen Johnston Laing,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68.
39. Julia F.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328. 侯一民回憶說其實這是他第二次被迫對這幅畫作出檢討。第一次是由於油畫的印刷品將原畫的色彩印錯了，他生氣地把油畫的劣質印刷件撕毀。那一次侯一民因毀壞國家主席的肖像畫而被批評是對國家主席不敬。不久之後，當劉少奇被冠上中國頭號走資派稱號時，侯一民被迫第二次寫檢討，這一次是要解釋他當初為何要將劉少

- 奇畫在主要位置。侯一民，《泡沫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06年)，頁58。
40. 李紹洲，〈我們的「安展」〉。張培森 1963 年 6 月訪談李立三的記錄稿，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2-5。
 41.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8.
 42. 戚本禹，〈七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同志在接見建工學院新八一戰士的談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
 43. 這位工人之前曾由張培森和展覽委員會的其他成員聯繫過，通過他得到了總理本人的許可。張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創作〉，載《炎黃春秋》第 7 期 (1998 年)，頁 32。
 44.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礦業學院以及萍鄉和安源當地的造反組織組成的「革命」研究員，在湖南和江西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他們的調查成為展覽大部分文字材料的基礎。這些成果在 1967 年 7 月油印出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
 45. 李紹洲，〈我們的「安展」〉。
 46.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8；李紹洲，〈我們的「安展」〉。
 47.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9.
 48. 同上，頁 338-39。
 49. Zheng Shengtian, "Chairman Mao Goes to Anyua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rtist Liu Chunhua," in *Art and China's Revolution*, ed. Melissa Chiu and Zheng Shengtian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8), 119.
 50. 江青、陳伯達、康生，〈中央文革接見鋼琴伴唱「紅燈記」演員等革命文藝戰士的講話〉(1968 年 6 月 30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1. 《文匯報》(1968 年 7 月 6 日)。
 52. 引自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80.
 53. 《光明日報》(1968 年 7 月 12 日)。
 54. 《解放軍報》(1968 年 12 月 2 日)。
 55.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頁 58。
 56.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9.
 57. 黃式國、黃愛國，〈「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後風波與歷史真實〉，載《南方週末》(2006 年 4 月 20 日)。
 58. "Picture of Priest in Vatican Is of Mao,"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69;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95.

59. 劉春華，〈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人民日報》(1968年7月7日)。
60. 同上。雖然毛澤東來自安源西邊的湖南省，因此指稱工人們面向東方仰望冉冉升起的太陽顯然是一種比喻，而並非單純是文字表面的含義。
61. 雜誌《美術》1964年第1期(42期)上刊登文章，批評侯一民的油畫將礦工們的形象畫得過於一般化，儘管侯一民本人在1961年第4期(21期)上發表文章，說明油畫上有幾位人物的形象是按照現實中數名與劉少奇關係緊密的安源工人的照片畫成的。
62. 關於這次運動的全面研究，參見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63. 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B105-4-302。
64. Laing, *The Winking Owl*, 69.
65. 張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創作〉，頁 36。
66. 李紹洲，〈我們的「安展」〉。
67. 根據李紹洲的回憶文章，這個展覽原本只分為五個篇章，顯然是由於當時大家認為毛澤東到訪安源一共有五次的原因。萍鄉市圖書館收藏的一份 1967年1月20日的紅衛兵傳單「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永遠照亮紅色安源」中，按時間先後順序羅列了這五次訪問。然而，之後大家又發現毛澤東去安源總共有六次。現今的官方說法是毛澤東從 1921年到 1930年期間到訪安源總共八次，儘管所聲稱的某幾次到訪的憑據僅僅是一些可信度相當弱的口述歷史。訪談黃愛國，萍鄉黨校，2009年10月。
68. 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了這一手冊的六個不同版本，依次來自於從 1968年到 1969年期間在北京、廣州、溫州、德州、襄樊以及某一未知地區舉辦的各個展覽。
69. 《從安源到井岡山》(北京：1968年7月)，頁 2。
70. 同上，頁 26。
71. 同上，頁 11。
72. 以頌聖體例來表現毛澤東在安源的故事而產生了一些文藝作品，其中有上海工人革命文藝創作隊編，《紅太陽照亮安源山》(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68年)和安源工農兵詩歌編選小組編，《紅日照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9年)。前一本書在印刷第二版時達到 30萬份，不過該書引起了一定的風波，因為此書以劉春華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作為封面，可圖中毛主席的臉上有一些斑點，好似鬍鬚未剃乾淨。上海革命委員會認為這一無禮行為代表着「對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於是下令徹查此事。後來調查出的情況表明這些黑點只不過是由複製劉春華油畫所用的木板紋路造成。雖然在第一次印刷時，這些斑點成功地被白色的粉末覆蓋，但是在第二次印刷時，這些粉末已經

- 脫落。然而，在第一次出版時，此書也引起了評議。張春橋批評封面圖片使用的金色油彩並不亮麗奪目，而且過於浮華；於是在第二次印刷時則改用無比至尊的帝王御用的明黃色。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B167-3-99。
73. 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401。
 74.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 222。
 75. 紅衛兵手抄傳單(1967年1月20日)，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76. 《紅安戰報》第 16 期(1967年6月30日)。此次展覽籌備了一個月，得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株洲鐵路技校的協助。
 77. Feng, "Jiangxi in Reform," 257.
 78. 張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創作〉，頁 35。
 79. 黃慰媛、黃愛國，〈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興建始末〉，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91-93。
 80. 同上，頁 393-95。
 81. 〈千萬顆紅心向着紅太陽〉，載《解放軍日報》(1968年7月9日)。收錄於《贊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頁 57。
 82. 〈毛主席啊！安源礦工永遠忠於您！〉，《人民日報》(1968年7月11日)。收錄於《贊革命油畫》，頁 21-24。
 83. 黃慰媛、黃愛國，〈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興建始末〉，頁 395-98。
 84. 蕭建萍，〈都是「燎原」惹的「禍」〉。
 85. 下文內容皆來自《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陳列說明(初稿)》(1968年10月10日)，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A6/3-29-5。
 86. 圖片的基本情況來自《民國日報》1925年4月29日的一篇報道。其中報道在前一天，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派來一名日本代表到訪安源，而工人們誤以為他是來解決工資拖欠達數月的問題。當工人們最終發現日本顧問只是來檢查由日本貸款的項目進展情況，並非肩負解決欠薪的職責，他們異常憤怒，於是向包括礦長舒修泰在內的調查隊人員潑了幾桶糞。此篇新聞報道收錄於《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89-90。
 87. 將劉少奇作為中國工人階級敵人的官方批判，參見《大工賊劉少奇是工人階級的死敵》(香港：三聯出版社，1968年)。宣傳冊的中心文章是1968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真工賊假領袖」的社論。依據安源煤礦革命委員會，社論批判劉少奇背叛了安源礦工的革命傾向。公安部長康生在中共九大上列舉了劉少奇作為「工賊」的「證據」。參見〈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大會上解答問題〉(1969年5月24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8. Lowell Dittmer,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Liu Shaoqi's Rehabilit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 no. 3 (May 1981): 455-80.

89. 《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陳列大綱》(1969年12月1日)，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322-B4-4-26。
9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 91-92。
91. 關於林彪事件對安源紀念館的影響，具體情況參見黃愛國，〈9·13事件前後的安源紀念館〉，載《萍鄉工人報》(2001年9月13日)。
92.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3), 169.
93. 關於林彪事件，參見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1* (London: Hurst, 1996).
94. 「蕭克將軍揭露林彪」，來自〈揭露大叛徒、大漢奸、大賣國賊早年的反黨錯誤和罪行〉(1972年5月20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5. 陳毅，出處同上。
96. 黃式國、黃愛國，〈毛主席去安源〉。
97.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C5-1-8 (1971年7月20日)。張春橋也提到有「一位同志」(推測是江青)提醒主席，可能由於歲月流逝，他或許只是忘了他曾穿的是文人長袍。
98. 黃愛國，〈9·13事件前後的安源紀念館〉。
99.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329-B4-4-29 (1972年7月1日)。
100. 劉春華，〈也談「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後風波與歷史真實〉，載《南方週末》(2006年7月27日)。
101. 黃愛國，〈革命的硬骨頭：記安源煤礦老工人袁品高〉，頁 368-69。
102. 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年5月3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3. 關於文化大革命對上海工人的影響，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104.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
105.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 671。
106. 同上，頁 608-9。
107. 同上，頁 558-59。
108.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92-93。
109. 同上，頁 280。
110.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 176-78；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 88-89。
111. 同上，頁 191。

112.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81。
113.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202。作者本人在 2005 年夏、2006 年夏和 2008 年夏，以及 2009 年秋天在訪談安源工人的過程中得到了相似的回應。
114. 1976 年 9 月 12 日，新華社關於毛主席逝世後人民敬獻花圈的新聞報道，來源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5.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Campaign Nostalgia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sian Survey* 39, no. 3 (May-June 1999): 376-91; Ching-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1, no. 2 (2000): 217-37.
11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117.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118. Emily 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Reassessing the Red Guards," in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ed.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59. 注意為了使文字更清楚，這段引文中的音譯從威妥瑪式 (Wade-Giles) 拼法轉變為拼音拼法。
119.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252-53. 女性和男性一樣被要求以理想化的英勇革命戰士為榜樣，那段時期產生的著名革命芭蕾舞劇（後來成為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
120. 毛澤東號召暴力行動並非只限於言論。兩周之前，北京一所精英女校的學生將老師毒打致死。〈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載《二十一世紀》（1995 年 8 月），頁 36-42。
121. 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257.
122.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50.
123.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江青根據自唐朝至明朝的帝國服飾風格為女性設計了一款新的「國服」。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256.
124. Ross Terrill, *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6.
125. 同上，頁 325。
126.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169.
127. *China Pictorial* 9 (1968): 44.
128. Donald E. McInnis, *Religiou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338.
129.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174.

130.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70.
131. 白霖 (Lynn White) 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推行的各種運動政策、階級標籤、主從庇護主義 (clientelism) 對於促成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至關重要。Lynn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2. 毛澤東主義和列寧主義對於文化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的概念差異，「在塑造蘇聯歷史和中國歷史上並非無關緊要」，參見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in *Bolshevik Culture*, ed. Abbott Gl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9.
133.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9), 63;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134. Emily Martin Ahern,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6.

第七章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1. Richard Curt Kraus, *The Party and the Art in China: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viii.
2. 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20.
3.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eds.,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Prestel, 2004); and Anne Warr, *Shanghai Architecture* (Sydney: Watermark Press, 2007).
4. 畫完劉少奇的肖像畫後不久，1962 年侯一民又開始繪畫毛澤東在安源的主題，雖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才完成創作。侯一民，《泡沫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5-7、58。
5.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侯一民創作油畫「毛主席與安源工人在一起」美術作品分析》(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年)。
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萍鄉：萍鄉市地方誌辦公室，1989 年)，頁 103。
7.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73-74。
8. 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75。

9. 收錄於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421。
10. 蕭建萍，〈安源又「熱」起來了〉，載《大眾電影》8期(2005年)。
11.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713。
12. 同上，頁718。
13.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577-B4-4-43。
14.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112。
15. 〈鄧小平為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題寫館名的前前後後〉，《安源周刊》(2004年8月5日)，A1-2。題字顯然正如館長們長期以來孜孜以求的那樣，成為紀念館的一把保護傘。二十年之後，在2004年8月正值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紀念館的研究員們稱讚鄧小平的題字令安源的革命歷史「永放光芒」。
16. 《安源路況工人運動紀念館陳列大綱》(1987年11月)。安源紀念館檔案室一份無文件編號的油印文件。
17.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7-007(1987年7月15日)。
18. 劉家林，〈毛岸青來安源參觀訪問〉，載《萍鄉黨史通訊》第1期(1988年)，頁89。
19. 劉傳政，〈風雨同舟，情感日篤〉，載《萍鄉黨史通訊》第1期(1988年)，頁76-78。
20.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029(1991年8-9月)。
21.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67。2009年10月作者本人訪問安源居民時，這個謠言曾多次被提及。
22. 劉南方，《東方驚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2。
23. 為紀念大罷工八十周年，紀念館又一次重新全面佈置展覽，於2002年9月18日向公眾開放。雖然這次展覽沿襲了上一個展覽(1992年)的政治正確性，也仍然籌備了近一年的時間。重新佈置的展覽增加了五十多件新展品，其中包括十九世紀由德國製造的鐵路器材與一個1921年在當地鑄造的鍋爐，以便突出本地為中國現代工業發展作出的貢獻。2002年的展覽按照年代順序將安源的故事分為慣常的六個階段，從煤礦的創建期一直講述到農村根據地的形成，另外增添了新的總結篇，列舉了二十多位從安源工人開始其革命生涯的解放軍將領。《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陳列內容大綱》(2002年1月11日)，由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收藏的無檔案編號的油印資料。
24. 〈沸騰安源〉，載《萍礦工人報》(2002年9月18日)。
25. Philip P. Pan, *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114-15.
26. 《人民日報》(1979年3月14日)。

27. 關於毛澤東熱，參見 Geremie Barmé,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28. 李紹洲，《為了國有資產的尊嚴見證法律的尷尬——參加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權益訴訟札記》，參見 <http://lishaozhou417.blog.163.com/blog/static/1266145112010622631193/> (李紹洲的個人博客)。
29. 同上。
30. 關於拍賣和訴訟官司的報道見《南方週末》(2006年7月27日)；人民網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6年12月4日)，以及中國新聞網 www.chinanews.com (2007年10月22日)。
31. 關於中國前衛藝術的全面介紹，參見 Karen Smith, *Nine Lives: The Birth of Avant-Garde Art in New China* (New York: Prestel, 2006).
32. 以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為題材而再創作出的這些繪畫和其他一些畫作，以及使用數碼技術改動原畫圖像而創作出的這類作品在互聯網上數量很多。
33. Zheng Shengtian, "Chairman Mao Goes to Anyua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rtist Liu Chunhua," in *Art and China's Revolution*, ed. Melissa Chiu and Zheng Shengtian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8), 129.
34. 認為今不如昔的這個傾向乃是一種全國性趨勢，在安源格外明顯(可能其他一些因毛澤東的革命活動而聞名的地區也是如此)，他們對革命的懷念之情反映人們對於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持批評態度。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Lu Hanchao,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The Resurgence of an Alienated Culture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75, no. 2 (Summer 2002): 169-86.
35.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62。
36.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頁 295。
37.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244。
38.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83。
39.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122。
40. 同上，頁 278。
41.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97。
42. 陳海平，〈一年祭〉，網絡博文參見 http://blog.163.com/c_chenhp/blog/static/84340903200851705425685/。
43.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45-46。
44.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頁 116。
45. 《中國勞工通訊》(香港)第 43 期(1998年7-8月)。
46. www.china-project.com/en-end/july0f.html (瀏覽於 2009年9月)。
47. Pan, *Out of Mao's Shadow*, 114-15.

48. 彙編自數年的萍鄉年鑒。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008年)。
49.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301。
50. 同上，頁 287-88。
51. 胡錦濤訪問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報道，載《人民日報》(2003年9月3日)。
52. Mollie Kirk, "Patriotism for Sale: Communist Apologetics in the Red Tourism Program," senior honors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2008.
53. 紅色旅遊項目在某些方面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為加強青年人的愛國意識而發動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延續。以前的愛國主義運動除了教材改革，還將包括安源在內的一些革命活動地點定為國家支持的學習參觀景點。Zhao Suisheng: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1998): 287-302; Wang Zheng,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 no. 4 (December 2008): 783-806; <http://tour.jxnews.com.cn/system/2004/09/17/000730857.shtml> (瀏覽於 2009 年 9 月); 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2366; 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1828 (瀏覽於 2009 年 9 月)。
54. 《萍鄉工人報》(2004 年 8 月 5 日)。
55. www.jxgdw.com/jxgd/news/jszt/2006jxhbh/hspx/userobject1ai610374.html.
56. 《萍鄉日報》(2005 年 6 月 7 日)。
57. 萍鄉市政府，〈萍鄉市紅色旅遊發展情況彙報〉，未出版的資料，來自萍鄉市旅遊局，2007 年 5 月 23 日。
58.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年)，頁 243；本文作者在安源紀念館進行的訪談(2009 年 10 月)。
59. 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2366.
60.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 年)，頁 146。
61. 2009 年 10 月 29 日本文作者在安源訪問安源區旅遊局局長湯江琦。約有十二部關於安源革命歷史的電影和電視連續劇在安源煤礦實景拍攝。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48。最近在毗鄰煤礦之處建成一個長期固定的電影外景地。
62.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116。
63. 同上，頁 212。
64. 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e, 2001);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65. 《當代中國的煤炭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 281；《中國煤炭志》(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99年)，頁 151；《中國煤炭工業年鑒 2008》(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2009年)。
66.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2006年)，頁 116。
67.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2005年)，頁 126–27。
68. 據萍鄉官方資料，自 2002 年至 2007 年期間煤礦事故造成 124 人死亡。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2005–2008年)。根據很多來源顯示，實際死亡人數大大高於官方統計數據。
69.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75。
70. 同上，頁 324。
71. 煤礦現今的出產提供中國主要能源需求的三分之二。2005 年中國的煤產量達到 22 億 3 千萬噸，近乎美國產量的二倍，而美國是全球第二大煤產量國。參見 *The Future of Coal: An Interdisciplinary MIT Stud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7), chapter 5.
72. 張學龍，《安源往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 402。
73. <http://hi.pingxiang.gov.cn/archiver/?tid-316.html>.
74. 劉南方，《東方驚雷》，頁 427–28。
75. 于建嶸，《安源實錄：一個階級的光榮與夢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76. www.youtube.com/watch?v=SqN8GevrtDU (瀏覽於 2011 年 8 月 23 日)。
77. 也有其他研究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專家研究過這個主題。參見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Chen Feng,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185 (March 2006): 42–60.
78. 收錄於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411。
79.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88。
80. 同上，頁 274。
81. 同上，頁 271。
82. 同上，頁 272。
83.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198–99.
84. 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85. 同上，頁 9。
86. 關於明朝文化的商業化的研究，參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and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關於政治體系的研究，參見 Charles O. Hucker, *The Ming Dynasty: Its Origins and Evolving Institu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87. Elizabeth J. Perry, "Popular Protest: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China Today China Tomorrow: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ed. Joseph Fewsmith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chapter 1.

結 論

1. 大家熟知的關於毛澤東的革命本質上是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這種論斷，參見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2.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 115-17.
3. Thomas A. Metzger, "*Transcending the West*": *Mao's Vis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Teng Hsiao-p'i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17.
4.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Geremie R. Barmé, *The Forbidden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精英政治反映了「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要素這一論斷，參見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關於大眾修辭在通俗文化上的起源的討論，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Revolutionary Rudeness: The Language of Red Guards and Rebel Workers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21-36.
6. Timothy Cheek, "Mao, Revolution, and Memory," i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ed. Timothy Chee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7. Guo Yingjie,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Zhao Suisheng,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關於民族主義在 1949 年之前的情況的詳盡研究，參見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eorge 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9. 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 53.
10. “Confucius Statue Vanishes Near Tiananmen Squar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11.
11.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12. 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13.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載《毛澤東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1年），頁155-56。
14. Delia Davin, “Dark Tales of Mao the Merciless,” in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ed. Gregor Benton and Lin Chu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0.
15.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16.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 這並不意味着創造一種新的蘇維埃文化是無用的。可參見 Bruce Grant, *In the Soviet House of Culture: A Century of Perestroik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本書出色地研究了庫頁島上一小群尼夫赫 (Nivkhi) 漁夫積極參與築造蘇維埃文化的情況。蘇聯工人同樣也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有關於此的具體研究可參見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8.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3.
19. Mark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1.
20. S.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0);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21.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7.
22. John Fitzgerald,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Dig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The Dignity of Nations: Equality, Competition and Honor in East Asian Nationalism*, ed. Sechin Y. S. Chien and John Fitzgera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114.

23. Quoted in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in *Bolshevik Culture*, ed. Abbott Gl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80–84.
24. Alfred G. Meyer, “Communist Revolu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5 (Winter 1972): 345–70;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Alfred G. Meyer, “Cultural Revolutions: The Uses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6 (Spring–Summer 1983): 6.
25. Zenovia A. Sochor, *Revolution and Culture: The Bogdanov-Lenin Controvers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8–29.
26. 同上，頁 229。
27. 《安源煤礦史》（長沙：湖南師範學院，1958 年），頁 209。
28. Charles E. Clark, “Literacy and Labour: The Russian Literacy Campaign within the Trade Unions, 1923–1927,” *Europe-Asia Studies* 47, no. 8 (December 1995): 1327–41.
29.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28–1933），斯大林表示文化革命是通過破除舊的文化權威來樹立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階級戰爭」。參見 Sheila Fitzpatrick,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i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ed. Sheila Fitzpatric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8.
3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00–1。
31.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156–61.
32. 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3.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61 (January–February 2010): 79.
34.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359–61. 關於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之間的隔閡，參見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35. 關於二者之間的比較，參見 Jae Ho Chung, “Central-Local Dynamics: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ed.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及 Elizabeth J. Perry, “Sixty Is the New Forty (Or Is It?): Reflections on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in *The PRC at Sixty: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 William C. Kirb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no. 1 (January 2003): 13–14;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7. Ching Kwan Lee, "What Was Socialism to Workers?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olitics in an Age of Reform,"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8–59.
38.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298。
39. 譚庚炳、黃愛國,〈安源精神的繼承和發展〉,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84。
40. 劉建民,〈安源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出處同上，頁193。
41. 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 (November 2008): 1147–64.
42. 中共審查部門於2010年8月31日寫給雜誌社的一封信件。
43. 劉再復、李澤厚,《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1995年)。
44.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201.
45. Liu Xiaobo, "That Holy Word, 'Revolution,'"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315ff.
46. 《南方週末》(2011年3月10日)。
47. Jeff Goodwin, "Is the Age of Revolution Over?" i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ed. Mark N. Katz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1), 276ff.
48. Eric Selbin, "Same as It Ever Was: The Future of Revolu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Katz, e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285–86.
49.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Raffaello Pantucci, *China's Janus-Faced Response to the Arab Revolu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011).
50. Jill Lepore,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The Tea Party's R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over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
51. 同上，頁14。